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3月15日第5期 总第15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1期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二）

【专稿】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串联](#)

【考证】

[肖文正 也谈“文革回忆录”可信度 ——蒯大富与1966年10月6日大会考](#)

[七尺从天 聂树人批聂元梓“北大武斗”造假考](#)

【评论】

[聂树人 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辩](#)

【述往】

[唐振权 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书摘】

[王大宾 《王大宾回忆录》（摘选）](#)

【资料】

[1. 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1966.09.23）](#)

[2.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09.28）](#)

[3. 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1966.10.03）](#)

[4. 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1966.10.09）](#)

[5. 阎长贵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及北京地质学院代表时的讲话（1966.10.12）](#)

【读者来信】

[1. 朱德瑜纠错](#) [2. 阎长贵指误](#) [3. 宋翔雁、刘昭明谈如何回忆历史](#)

[4. 胡宗式指正150期](#) [5. 陈闯创指出第150期的诸多笔误](#) [6. 刘明来信](#)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宋翔雁，1937年生人，1959年2月提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并留校任教。1975年至1985年武汉地质学院任教，间或在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授课。1986年至1997年，任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技术方法室研究员（1997年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改名为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02年退休。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串联****宋翔雁**

在文革结束几近五十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

——作者题记

一、“反干扰”后出现的初次大辩论

时至七月下旬，在京各高校的革命师生们，普遍都经历了反对工作组后类似于地院的“反干扰”镇压，身心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正在此时，北京大学出现了点名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大字报。大字报将此前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行动，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张在北大执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毕竟，北京大学是经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肯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诞生地，所以，燕园的这一动态，对北京各高校运动的走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地院内部的“反干扰”表面上已偃旗息鼓，工作组的威望也已跌入谷底，运动似乎处于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当时地院的众多学生，都纷纷前往北大或其他院校看、抄大字报，听他们的辩论，并将信息带回学校。而很多教职工则主要通过亲友和老同学的关系，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信息传回地院。在这种形势下，各基层（主要指教师们所在的教研室）的学习、讨论会多是交流信息，别说批判，就连激烈的辩论都很少听到。原来批判和被批判的对立双方，似乎成了一个统一体，都在观望、等待下一步运动将如何推进。

而在“反干扰”批斗时，被工作组定性的高元贵、李贵、安静中、郑伯让、王大来、陆炎德、张海涛、刘万翔等十三名反党分子，以及与我类似的所谓“黑干将”、“小游鱼”等（虽工作组并未宣布统计数字，但估计也会有数十名之多）教师中的少数派们，此时的心境就更为复杂——当初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抱着一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投身文革的。面对工作组的一系列违背群众意愿、偏听偏信地将拥有极高人望和群众基础的高院长定性为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的错误做法，对工作组提出了批评，并予以抵制。未曾想，工作组竟挥舞起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大棒，将这些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并在“反干扰”批斗期间，对这些人进行了残酷的人身迫害！因此，我们这些人也在不断地从各种信息中思考分析，力图辨别真伪，分辨出哪些才是中央真正的声音。彼此有机会相见时，也会尽可能地交换意见，互道珍重。但终因形势不明，“反干扰”中的一

些干将尽管不再公开地批判、指责我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们对我们的行动和言论，无时不在地予以监视和注意。因此，我们之间若有交往时，都会非常注意隐蔽，尽可能避开公众的视线，以免被诬为继续搞“黑串联”，又被抓个“现行”。这种状况，也可算文革中的一种“奇葩”——群众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为避免“惹事”，处处防范着来自对立一方人员的盯梢和窥视，就如同生活在一个特务横行的国度一样。事实上，这种现象——一部分人（多为出身好的或积极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监督另一部分人（多为出身不好的，或被定为落后分子及有历史疑点的人），并将听到或看到的情况，向相关的部门或人员汇报——自建国后就始终存在，并被当政者美其名曰“群众专政”而加以充分肯定。

我从这类有限的交往中感到，在我们这群人中，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在内心涌动着：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工作组定性的反革命分子、黑干将、小游鱼。但这顶帽子的摘除却不能靠工作组发善心，而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断地据理斗争（但现在看来，这种来自理想主义的信念，在一党领导、一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下，也只是一种十足的政治幼稚。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一言九鼎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公之于世，没有最高指示——“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见诸报端，没有“工作组执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指示的下达，我们这批人的反革命帽子再据理力争也是摘不掉的。这种情景在建国后的历史上，是不乏实例的）。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不再受原来规定的，以系、教研室为单位参加运动的羁绊，开始自己外出看大字报、自己学文件，与不同的人交换信息和意见。

这种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教职工中的造反派大联合即将到来。但必须指出，经历了“反干扰”冲击后的教师队伍，自身的包袱和私心、顾虑（如出身、历史、家庭等）远较学生为大，因此在具体行动上就显得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如写大字报时大多数均以个人署名而不再联合署名，少数派教职工的联合组织（“红教联”及“红干联”）的成立，也晚于学生造反派大联合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建立。而且，在我的印象中，“红教联”和“红干联”最终还是在“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的洪流推动之下，顺势而立的。

与此同时，来自学生的揭批、反对工作组的势头更远高于教工队伍。他们有不背包袱（出身、个人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的巨大优势，再加上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时不我待的革命激情，很快就组成了各系、各年级、各班级内不同的战斗队，贴出了各类观点明确的揭发、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一下就把运动的大方向从“反干扰”扭转到反对工作组的“反干扰”的方向。不仅如此，少数学生的大字报（如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还借助于北京大学反对张承先的声势，明确地指出以邹家尤为首的地质部工作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这类异常尖锐的诘问，工作组还想死守“反干扰”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最后防线，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再次暗中组织不明真相、支持工作组的师生，发起对这类大字报的攻击和围剿，从而地院内再次爆发了支持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论战。但这次论战与“反干扰”前期的论战已有了明显的不同：尽管支持工作组的大字报明显多于反对、谴责工作组的大字报，但前者却处于守势，经常以邹家尤副部长此前总结时强调的话作遮羞布（即，此次工作组进院时间仓促，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简单、生硬，从而挫伤一些群众的积极性），而不像过去那样以势压人，一再强调我们是党中央派来领导运动的。相反，后者的大字报尽管数量相对少些，但却完全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势，因当时大的舆论环境中，“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论述已见诸报端，北京大学反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大辩论在地院已广为人知，这一切都给了反工作组的革命群众以巨大的支持。面对着多数人的不理解，小将们毫不退让，据理力争。通过回顾工作组进院后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如不顾广大群众对个别党委委员聂克、周守诚、李庚尧等人的大量揭发，就将运动矛头锁定在高元贵头上；在革命群众对院党委的问题和工作组的部署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是引导群众继续深入揭发地院党委存在的真正问题、听取不同意见求得统一认识，而是拉大旗作虎皮，挑动群众斗群众，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掀起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干扰”运动等……坐实了工作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一阶段就工作组进院后的工作是正确还是谬误的大辩论，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反

干扰”前革命群众与工作组对运动矛头指向、如何开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对立、分歧，而演变成了“反干扰”是否必要，“反干扰”错误的性质是什么等原则问题的大辩论。以小将为主的少数派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反干扰”是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疯狂镇压学生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罪恶的铁证！工作组自始至终执行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一条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地院内部两派关于工作组错误性质的辩论，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上层斗争的反映，但身处底层的广大学生却难以知之。但何以小将们又能如此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多数派和工作组展开毫不妥协的唇枪舌战呢？我以为，这是与他们在前段运动中的经历分不开的——这些小将，特别是他们中的中坚骨干们，在“反干扰”时期也都成为被打击和批斗的对象，他们同样有一个出路的问题。大家都懂得，唯斗争而自由的简单道理，既是人类生存之道，也是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反干扰”之后出现的这场关于工作组是否犯了错误和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的辩论，是在工作组已经失去了其领导高校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即因报刊上不断透露出来的毛主席七月中旬末回京后的一系列指示，剥夺了工作组继续领导运动的合法性），无法再站在前台直接指挥、干预、掌控的状况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但当时中央尚未形成正式的中央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所以形势尚有待进一步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理念（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下来的，是党领导的化身）依然控制着众多群众。因此，地院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仍继续支持、袒护工作组。这些人为工作组所犯的錯誤辩解，并支持工作组所下的结论：“反干扰”是必要的，黑线人物和反党分子是存在的。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为分界线，地院师生员工明显地分化为两大派别：保皇派（保工作组）为多数派，造反派（反工作组）为少数派。

“反干扰”落幕后出现的这场辩论，其直接后果是孕育了地院造反派的大联合。因辩论中尽管少数派的立论有据，观点清晰，行文和言辞犀利，但毕竟人数较少（回想起来，我估计少数派所占人数比率不足总数的10%，而多数派估计占65%，其余25%左右多为左右

摇摆的和逍遥、观望的），多少有点势单力孤，难于打开局面。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打破系、年级、班级（对教职工而言，则是打破系教研室和基层行政单位）的界限，走联合起来的道路是唯一的选择。

二、“东方红”成立，地院实现造反派大联合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在这一中央文件的支持和指导下，八月中旬，地院少数派的造反组织之一的“东方红战斗队”顺应形势，率先联合；全院各个造反战斗队的联合组织——“东方红公社”应运而生。

在小将们大联合的推动下，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们，也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相继以“红教联”、“红干联”的形式，加入到“东方红公社”中。从而实现了北京地质学院少数派的大联合。自此，“东方红公社”就成为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唯一的造反派组织。应当指出的是，“东方红公社”所代表的地院少数派的大联合，引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运动的发展潮流。它不仅是北京地区第一所少数派走向联合的高等学校，而且也是全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就很快实现了造反派大联合的高校。

还要指出的是，在北京“红八月”的特殊政治语境和社会氛围下，地院“东方红公社”（以下简称“东方红”）与当时北京各地区、各单位出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不同。它不要求其成员的个人出身必须是“红五类”，从而打破了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对广大群众的桎梏，受到师生员工的欢迎和肯定。这一特点既反映出当时“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们（含“红教练”、“红干联”）的胸怀，也表明“东方红”真正把“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的政策落到了实处。而这正是这一组织能迅速发展壮大，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度执地院文革之牛耳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地院在文革初期（工作组撤离至工、军宣队入校期间——1966.8—1967.9）的两派争斗中，在校舍的破坏、财物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等方面，都低于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重要原因。文革结束后，地院的教职工，特别是那些出

身不好或历史上有疑点的教职工们普遍认为：在文革最动乱的时期，是“东方红”的小将们，使他们免遭了很多非人的待遇和迫害。对此，大家心存感激。

还应指出的是，在地院少数派大联合的同时，与之对立的多数派师生员工群众也形成了统一的组织——“斗批改兵团”（即所谓的“保皇派”）。该组织联合前各单位战斗队均得到工作组的支持和肯定，并一度成为工作组发动“反干扰”、镇压革命群众的有力助手。“斗批改兵团”尽管是一个多数派组织，但与“东方红”相比，她在地院缺少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惠顾。

所谓“天时”指的是，在政治上，随着《十六条》的公布，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声音，已宣告了工作组无可挽回的末路。因此，依靠工作组并得到其肯定的多数派群体，在政治上不能不处于劣势。

所谓“地利”指的是，在地院广大师生员工的心目中，对地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评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心向背——在地院原党委的领导人中，高元贵院长无疑具有最高的声望和人气。他在近八年的领导岗位上，辛勤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抓教改和教学质量；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老教授、关心爱护年轻教师的成长；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深受广大教工的爱戴——正因为如此，当工作组将矛头指向高元贵时，立即遭到很多教工的质疑、抵制和反对。而多数派的群众在这一问题上唯工作组旨意是从的作法，背离了地院广大教工的心愿，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所谓“人和”指的是，造反派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在运动初期的迫害中浴火重生，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心灵经受了大的洗礼，斗志弥坚，视野愈广，心胸也更加开阔，从而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团结、更能吃苦、更有战斗力。与之相比，多数派群体及其核心成员没有这样的经历，加之长期习惯于唯上是从和跟风听命，其内部很难达到“人和”的境界。尽管暂时人多，也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决不可能变成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群众组织。

地院两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对峙”现象，表面上看，虽与文革时期北京和全国各地

区、各单位的情景一样，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地院“东方红”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将斗争的指向对准了由地质部党组派出并得到国家计委工交口党委支持的工作组，而不是纠缠于对地院党委的个别成员，即当时人们所说的“矛头向上”。因为地院文革初期出现的问题是因工作组自身所犯错误引起的，但其根子却来自它的领导——地质部党组和计委工交口党委。若不抓住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就很难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东方红”成立不久（约八月下旬），即组织了和平进军地质部（即所谓“一进地质部”），静坐部大院，要求部党组交出工作组组长邹家尤，责成他回校检查交代。

“东方红”核心领导的这一认识和行动，在京城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地震”，引起了上层和中央文革的注意。北京新市委不得不派工交部政治部主任陶鲁笳来地院“过问”运动情况，中央文革也先后派出了肖力、关锋、戚本禹、阎长贵等人作为联络员来地院了解情况，指导运动。地院“东方红”也由此得到了通天的美誉。不过分地说，在那个时段（1966年8月下旬至1967年4月），“东方红”领导下的地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推动和指导各地运动的一块“试验田”。也正因此，后来地院“东方红”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都成了造反派组织中的翘楚。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说当初地院“东方红”之所以能红遍京城乃至全国，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组织通过批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抓其在部委、计委等中央上层的黑后台的做法，与毛意欲“炮打司令部”，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战略恰好吻合，从而得到他老人家的默认和首肯，并由以毛为后台老板的中央文革出面支持，不断地给予暗中引导、指点，促使地院“东方红”（当时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将地院“东方红”简称为“地质东方红”）跨出校门，杀向北京乃至全国。

因此，在文革结束几近五十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无论是才智过人、嗅觉敏锐、充满献身精神且又激情满怀的众多小将，还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革命干部和教职员工们；不论他们最初的心愿多么高尚，多么纯真，也不论他们后来的人生经历多么跌宕起伏），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

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

作为地院“东方红”造反群体的一员，在对我们的行为定性的同时，我也还想为自己特别是为那些才智过人、心无城府、胸怀坦荡的小将们辩护几句。即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与“四人帮”江青之流相比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群体不是阴险的政客，也不是出尔反尔的阴谋家。他们是一群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虔诚信徒，坚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苦行僧，诚心诚意地要按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锤炼自己，做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受理想主义的灌输和熏陶，身陷于伟大领袖布局的革命洪流中，冲冲杀杀、自我陶醉，而难以自拔。因此，这些人是有理想的战士，既与阴谋家、政客不同，也与绝对盲从的“愤青”（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用现代流行的词汇）有别。和前者相比，他们心存底线，有相当的是非界限。如奉中央文革旨意，两次派人赴川抓彭德怀同志，但当听取了彭总的自辩，了解相当真相后，相继抵制，没有执行。但得知中央文革意欲换将再抓时，不得已才第三次将彭总抢到自己手中并护送回京，沿途并无任何不当的暴力举动，直至将彭总安全、完好地交到中央为止。又如，无论在京或在外地，尽管地院“东方红”在各地各单位支持造反派，参与了派性斗争，但基本上没有去迎合或挑起当地的武斗。

在一进地质部的“地震”压力下，地质部党组不得不允许邹家尤回地院听取群众意见。为此地院对立的两派（“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在地院大操场举行了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根据田春林同志的回忆文章，确切时间是1966年8月23日夜至8月24日凌晨）。

辩论会由北京新市委的领导成员之一陶鲁笳主持，显然，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打招呼，北京新市委未必会直接出面过问地质学院两派群众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就我的回忆，在文革之初的八月下旬，新市委领导人到基层了解和指导运动尚属首次。当然，新市委领导人的到来，究竟是新市委的决定，还是有中央文革意见，只能靠知情者来披露）。

两派大辩论的全过程，充分展示出“东方红”的才智、勇气和冷静，最终在“斗批改兵团”无言以答的窘境下，以“东方红”的全胜而告终。从此，“东方红”这一少数派群体，一下变成了地院的多数派，使地院的文革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造反派的逆转。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场辩论是文革中少有的说理斗争的典范（除辩论过程中，双方群众呼喊口号时有些剑拔弩张外），为此后的地院文革开了一个好头。

当地院“东方红”发展壮大成了多数派后，其领导们的注意力仍然放在院外和上层，而对院内的运动却较少关注。如对地院党委的问题，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问题（当时社会上，特别是知识份子成堆的高校，都比较重视），其他所谓牛鬼蛇神等问题的揭批，以及学校自身的教育改革/革命如何深入进行等都缺少应有的关注。应当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上层关于文化大革命与高校的教育改革/革命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院校应当如何办，甚至关于高等院校究竟要不要办等重大问题，并无比较清晰又可操作的设计、考虑和相对比较明确的指示。当时人们只知道刘少奇曾说过：理工科高校要搞半工半读；毛泽东曾说过：理工科院校还是要办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左倾思潮泛滥的当时，更多来自上层的“传闻”犹如：农业大学办在城里简直莫名其妙（大意）等“名言”，令人捧腹。为此，我们一些人也顺其意讥讽地说：今后地质学院就应当办在火车和轮船上（因搞地质的必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踏勘）。所以平心而论，在那个时间点上，要求小将们考虑教育改革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更重要的是，文革当时的斗争焦点仍处在中央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上，小将们要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也就无可厚非了。

放在院外，放在上层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北京已经有了两个红卫兵司令部的情况下，“东方红”的核心领导之一周永璋，

积极活动筹备并组建了“首都三司”，并以“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为其负责人。“三司”成立后明显得到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从而使地院“东方红”更加显赫京城。同时，也为其执行自己的战略思路提供了组织上更为有力的保障。

2. 为了推动相关部门和单位、地区的运动，在北京市组建了许多联络站（如驻地质部联络站、驻民委联络站、驻文艺口的联络站等），此后，更在京外组建了许多驻外联络站，重要的有驻上海、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联络站。其任务就是支持当地“真正的造反派”，并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当地上层；同时也借助自身的渠道，将外单位或外地文革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等及时反映给中央文革，借以寻求来自中央对相关地区和单位造反派的支持。

如前所述，地院“东方红”在外、向上的造反战略，既反映了其核心领导人的胸怀和魄力，也适应了毛泽东需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完成上层夺权斗争需要的战略部署。所谓“时势造英雄”，“东方红”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造反派队伍就是这样铸就而成的！

在“东方红”基本放弃学校运动而走向社会的情况下，“斗批改兵团”则跟随“红八月”时北京兴起的“破四旧”浪潮，在地院对所谓“五类分子”（主要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被点名的学院领导人）进行了抄家，并在“教工之家”展出了查抄成果。这是地院内发生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全院统一部署、针对教职工家庭的查抄行动。这种举动在广大教职工队伍中是没有市场的，但迫于形势（所谓的“红色恐怖”），人们只能哑口面对并在基层单位的组织下前往观看，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

三、地院抄家：我的唱片、邮票与相册

在地院红卫兵的这次全院统一查抄行动中，我个人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我从中学时代起就经常参加在北京南河沿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古典音乐欣赏晚会（每周一次），从而逐渐养成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而且这一爱好一直延续至今。

当我工作后，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提出了“劳逸结合”的政策，以应对当时

因粮食、副食供应匮乏造成的浮肿、夜盲和女性闭经等营养不良疾患。为此大大削减了各类非教学活动；即使是教学活动，也必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这样就使个人支配的时间明显增多。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跑旧货店、废品店、委托行，购买了为装音箱、中放、多速电唱机等音响设施所需的元器件和半成品。确实不负天下有心人，经过一段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能播放 78、45 和 33 转/分唱片的音响装置。并在国际书店和委托店逐渐购买了一些新的或旧的古典音乐唱片。自此以后，我就不再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播放时间的制约了。因中央台（包括北京台）古典音乐的播放时间绝大多数都安排在午夜 23:00 时之后，这对需要正常作息的上班族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就这样，闲暇时我就自己放点古典音乐唱片听听，它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有时也会有喜好古典音乐的其他老师甚至学生到我宿舍来听音乐，大家一起欣赏也是一种乐趣。这一现象尽管和现代年轻人搞的“派对”没法相比，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算异类了。所以困难时期结束后不久，很快就有“喜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议论传出，因为这些都是“西方”的；即使是苏联的，也因苏联已经变成了“苏修”，而统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甚至被冠以“精神鸦片”而纳入必须被否定的范畴。对于这些议论，我觉得只不过是成见或偏见，一以贯之地不予理睬。因我觉得自己没错，这也是我个人的性格使然——面对是非之争，只要我认为自己没错就我行我素。但因地院查抄之前，周围有些院校特别是北京市内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查抄活动早已展开，形成了令人生畏的所谓“红色恐怖”浪潮，这也给我敲了警钟。因文革初期“红色恐怖”的震撼则远非上述的议论或成见可比，加之经过“四清”历练后的我，也不再像当初那样单纯了。而且，“反干扰”期间的批斗，也让我领略了阶级斗争的暴力性和残酷性，所以面对这类可能涉及到自身的查抄活动，绝不可等闲视之，应当有所防范，避免留下后患。

基于这一认识，我认真地思考着红卫兵小将们是否会抄我的家（当时我尚未成家，住的是西一楼 209 室的集体宿舍）。思考后我的结论是：被查抄的可能性极大。尽管当时我已是东方红的一员，但对立方“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们出于两派斗争的需要，恰恰可以

利用我的出身问题做文章；特别是又有“反干扰”所做的铺垫，更可以捞一把稻草。加之当时中央某些领导人认可红卫兵的打人行为，有所谓“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舆论，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有此考虑后，我仔细想了家中可能存在的隐患，认为有两方面物品必须尽快处理，即（1）所有的古典音乐唱片；（2）从儿时至今我所积攒的中外邮票。

对于近百张唱片，我真舍不得毁掉。这不仅是我节衣缩食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而且今后不见得还能买到。故我找到文革期间结识的勘探系63级学生王群，问他是否想要这些唱片（文革初他到我家来过，看到我的唱片时表现出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当即表示：要，而且是替我保存。对此我分外欣喜，但表明是奉送而非保存，并约好他来取的时间。后我如约将全部唱片整理好（只留了一套《东方红史诗》），让其带回家中（其父是留苏的铁路系统的干部）。约1975年秋，他在北大进修遥感地质期间，还多次到地院打听我，并最终找到了我。当时尚未给我落实政策，在院内领导打招呼不得给我安排工作的情况下，教研室领导还是网开一面，同意我参加一外协项目，借调到铁道部第三设计院从事施工钻机设计。为避免在外扎眼，我们就在家里聊了很久，分手时互道珍重而别。

唱片问题解决后，我又着手处理我二十年来积攒的邮票。首先我将民国时期的邮票全部销毁了，因为怕被说是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头像、开罗会议三巨头、中美友好条约纪念邮票等；另外，还销毁了一张清朝末年的小龙邮票。我清楚地记得，这张邮票是我刚开始集邮时，父亲给我的，而且当时我也知道该邮票是稀罕物，价值不菲，但为不惹事，还是狠心烧掉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因当时我住的是集体宿舍，而非个人的封闭空间，所以从事这些活动时，必须考虑到同室居住同事的态度。好在他是我的中学校友，比我高一届的留苏生。因我提前毕业，所以他反比我晚工作一年。后因其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故回国后他一向谨小慎言，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工作。但他为人正派，极少卷入他人的纷争之中。基于对他的了解，我坦诚地向他讲述了自己担心有被查抄的可能，想抓紧整理一下自己的唱片和邮票，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他很爽快的表示没有任何问题，他可以给我创造条件，而且不会向任何人谈起此事。有了他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我很顺

利地完成了这两项清理工作；觉得即使被查抄，似乎也没有任何把柄会被抄到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此话不可不信。

对我的查抄，是在统一查抄那天的傍晚，来的是探工系 65 级的学生，带队的是于长友同学（1970 年分配后被河南省地质局退回，故留校任钻探教研室教员）。他们进屋后就亮明身份，称奉“斗批改”总部的指令，要查点我个人的物品中有哪些四旧的和反动的东西，并让我指明那些东西是我的。宿舍面积仅 12 平米，个人物品有限，查抄过程看来很快就能结束了。这时有位同学问我有没有照片和相册，于是我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本相册给他。相册并不大，保存有我儿时、中学和大学时期的照片，以及我生母和姐姐们的照片，此外还有两张我父亲带着我们在生母墓地祭奠时的合照。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对这两张照片发生了兴趣，相互传看，并低声仔细地推敲着什么。后来就拿着这两张照片问我：这是什么照片？我回答说这是我们全家人在祭奠我生母时在墓地的合影。继而又问我：哪个是你父亲？我指着照片说，抱着我的人就是我父亲。接着又问我：站在两边的两个军人是谁？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时其中一个学生很气愤地喊道：给你妈上坟的人是谁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当时我极其冷静地指着照片上的我，回答道：你看看，这就是当时的我，刚满三岁一个月，你说能知道吗？这时带队的于长友赶快转移话题问道：他们为什么穿的是国民党的军服？我也随即回答说：当时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们应该是陪同我父亲一起来的，所以会穿军服。这时又有学生说道：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至今还保留有穿国民党军衣人的照片，我们得好好的查查。说毕将两张照片收入了他们带来的解放军用的小背包中，并以命令式的语气说：这个问题你也得好好想想并交代清楚。说完他们就撤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 209 房间的东西两侧已围了很多人在观看，但并非本层居住的探工系的教工，多数是学生（红卫兵）。这就是对我家查抄的全过程。在查抄过程中，除个别学生的言语比较粗暴外，其间没有任何肢体接触发生。但被抄没的两张照片，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还给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还给我了（大约在步行串联前，我曾问过于长友同学，当时抄没的照片是如何处理的，能否帮我找回。事后他对我说：查抄回去后，就马上将照

片交到总部那了。这次他去问，管事的说，一些大的实物和财物，都有登记和保存，但照片和一般的纸质资料，几经搬迁恐怕很难查寻了）。

这样就使我不仅失去了生母墓地的全景照（文革结束后，大约1977年夏季，我借出差之机去湖南耒阳扫墓，但生母墓地已不复存在。经打听方知，因文革时耒阳火车站扩建，墓地已被平毁了。如今我的子女均在国外，想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知晓他们的奶奶和曾祖母的墓地情况已再无可能，这是多大的遗憾呀！）。

此外，这次查抄也使我永远丢失了保存在我手中的生父的唯一一张照片（我生父后于1980年经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审宣布平反，肯定了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贡献，按起义人员对待，历史问题一律不计。但此时作为长子的我，手中竟然没有一张他的留影，只能在解放军发给的起义军人证书上，复印一张他的人头小照作为安慰）。

到此，我还想再说一点，尽管这类查抄活动带有一定的恐怖味道，但若与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血腥查抄相比，应该公道地说“斗批改兵团”小将们的查抄相对还是比较“文明”的。即除了语言呵斥和责令外，基本上没有听说发生过恐吓、体罚和残暴的殴打现象。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类活动给当事人心灵带来的创伤却是难以抚平的。故我觉得，参与当时查抄活动和指挥这次查抄活动的小将们，似乎也应有所反思和自责，不能因地院的查抄活动比较“文明”而自我原谅。

更重要的是，“斗批改兵团”组织的这次全院大查抄，恰恰是地质部工作组进院后所执行的资反路线的继续。或者说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仍然继续在迫害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这可以从当时查抄了“反干扰”时期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黑线人物、小游鱼等造反派们的家得到充分证明（但我无法证实在这次查抄中，被工作组在“反干扰”中定性为反革命和小游鱼的打击对象，是否全部都被查抄？这有待于更多人的回忆来证实）。■

【考证】

也谈“文革回忆录”可信度

——蒯大富与1966年10月6日大会考

肖文正

本人是文革史的业余研究者。感谢《记忆》编辑的辛勤劳动，使我看到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第145期）。其中有一篇聂树人先生的文章：“文革回忆录”可信度之我见——兼评《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失实。

聂树人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文革回忆录”可信度问题。现在距离文革的发动，已经半个世纪，任何一个亲历者的回忆录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当然也包括聂树人先生的回忆录在内。

对于聂树人先生文章中所述之事，本人针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件，进行考证，验证回忆录可信度，供研究者参考。

1966年10月6日大会，是聂树人先生文章中列举的最值得考证的事。聂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以及他的著作中说蒯大富和韩爱晶造假，说他们都没参加大会，与大会筹备无关。本人考证发现，聂树人先生、韩爱晶先生以及沈如槐先生、王大宾先生的回忆都有可贵之处，也都有欠准确之处。关于1966年10月6日大会，请看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版：

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

1966.10.07

（十月七日上午 10:15~13:55 在中南海内接待站接见部分福建赴京革命师生的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叶群。接见时张春桥、关锋同志作了讲话，陈伯达同志和叶群同志还分别用闽南话和福建话和福建同学亲切交谈。被接见的单位有：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等八个福建院校及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的代表共 70 余人。）

……道路是曲折的，你们回去应该这样想问题。你们写条子上来，说要急着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几个学校去看，他们斗争比较尖锐，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的被孤立时只剩下 10 个人。（关锋插话：有的被关起来。）昨天去念通电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当然我们也有受压迫，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诉苦了。（笑声）

我们感到困难和你们不同，你们和这样学校有些类似，是否和他们联系，学习他们。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谈谈话，到国防科委门口等了 28 天 28 夜。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两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

十月一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们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笑声，热烈鼓掌。）

你们困难还不是最大，但你们受到的迫害，我们很同情。中央的态度很明朗，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多和他们联系，他们经验是什么，现在开始变化了。昨天的大会就是标志，主席台上的人好多就是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我念决定时，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们以后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现在不是同志了吗？中央的批示你们听到了吧？（众：听到了！关锋插话：如果他们再戴你们的帽子，你们就叫他们把指示拿出来，读给大家听。）

这方面的压力，中央能作到的，中央决不会不管。但就是这样，革命还是靠自己，要有勇气，多动脑筋。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四个

多月来斗争是艰巨的，曲折的。可能现在形势又好转些，但斗来斗去还会发生变化，可能要经过多次反复，毛主席这条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张春桥、关锋在大会第二天接见福建群众代表的讲话证明，蒯大富昨天去念通电。以上史料，在当年学生记录整理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也可以找到。史料说明，蒯大富在10月6日大会念通电。而蒯大富本人在口述中多次声明，是韩爱晶让他去念的。

由于年代久远，在许爱晶（韩爱晶先生）的《清华蒯大富》书中，清华414沈如槐先生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王大宾先生的《王大宾回忆录》书中，都把蒯大富念通电信成是念誓词，有兴趣者可去查阅。可见，他们的回忆也都出现了差错。

1966年10月6日大会的高潮，当然是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在这个十万人的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恰恰是北航红旗代表井然（当时名字井岗山），大会最后压轴戏是蒯大富念通电。稍有常识的人，可以看到北航韩爱晶、清华蒯大富与这个大会的关系。如果这个大会的筹备与这两个人无关，别人会把开场发言和压轴戏让给他们吗？

回忆文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不要匆忙下结论，更不能用不恰当的言辞对待与自己说法有差异的人。希望亲历者们心平气和，认真考证，共同努力，给世人提供尽量准确的历史文献。希望《记忆》成为弄清历史重要细节的平台，避免那种攻击漫骂的无聊文章！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16年1月20日

【考证】

聂树人批聂元梓“北大武斗”造假考

七尺从天

聂树人在《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一书专辟一章，题目就是“聂元梓、蒯大富是武斗的罪人”（第十二章），这一章第二节的题目是：“揭穿聂元梓的‘武斗’幻觉”。下面是这一节的摘录：

在《聂元梓回忆录》中，假话很多，其中一条是，编造了1968年3月25日地派七院校学生到北大大搞武斗。在该书的257页至273页，聂元梓写道：“我们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三·二五’大武斗事件。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

在摘录了上面这些话之后，聂树人写道：“接下来，描述聂元梓如何找谢富治，还有吴德等，去北大制止武斗，洋洋洒洒，写了十五页，上万字，可是，这都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聂树人的结论是，“当年聂元梓、孙蓬一想多了，想得入了迷，以致几十年后，她把想的就变成了真的。”

聂树人说聂元梓造假的证据有二，一个来自《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8年4月11日该报刊载的一份来自《东方红公社》总部的声明。声明说：“资产阶级政客聂元梓、孙蓬一之流，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转嫁危机，逃避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公然挑

起武斗，毒打我两名到北大刷大标语的东方红战士，甚至无耻地假冒新北大井冈山的名义，向我院和其它院校打电话，欺骗我们出车派人去北大，阴谋拉人下水。然而，我们识破了其阴谋，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就借助于造谣诬蔑的流氓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贴标语、散传单，反诬我东方红战士到北大挑起武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一是聂树人的亲历。他说，为了纪念“4·8事件”、“4·11事件”一周年，地院两名东方红战士熊兴武、黄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看到不顺眼处，即刷了两条大标语。这下，惹恼了北大聂元梓、孙蓬一及其拥护者，他们将这两名东方红战士抓去，用麻袋罩住头，拳打脚踢，用皮鞭木棒殴打，达两天之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两名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熊兴武的肾被打坏，生命垂危，最后，不得不送往北医三院去住院治疗。”

聂树人交待医生全力抢救，务必用心。另外，他们打电话给新北大井冈山验证，人家根本没有打过让各校出人派车到北大来的电话。“从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我们一个人也没有往北大派。”（《北京天派地派争斗》第254—256页）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时间，二是情理，三是小报的可信度。此文只谈前两个问题。

聂元梓说的事发生在3月25日，聂树人拿出的所有证据都发生在4月份。时间对不上。

关于外校到北大武斗，《北京大学纪事》1968年3月的条目下有如下记载：

3月20日，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庭”，“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4日，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另，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有如下文字——

这段时间，北京“地派”对北大井冈山的支持逐步升级，反对聂元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三月二十日，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开始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后几天，“地派”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反对聂元梓，支持井冈山，并发生小规模冲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25日赶到北大讲话，表态反对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还是不早不晚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第146页）

看来，聂元梓并没有说假话。另外，造假骗人需要审时度势。如果是小范围内发生的事容易造假，反之则不易造假。原因很简单，范围大，耳目多，揭穿的机会也多。1968年3月25日多所院校的上万人涌进北大，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大广播站讲话，劝退学生。这种事不易造假——你怎么可能改变集体记忆？怎么可能堵住所有当事人的嘴？聂树人认为，聂、孙二人是把武斗想入迷了，所以以假为真。这种说法，不合情理，不合逻辑。

如果聂元梓说的是真，那么聂树人就造了假。聂树人在此书的前言中说，他之所以写此书，是“为了历史的真实”。他批评一些文革研究者：“还有一些文革时才几岁或十几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如唐少杰、印红标、周伦佐等，他们经过文革，却对文革一知半解或知之甚少；他们研究文革的态度很虔诚，很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却失之道听途说和推断。特别是，他们以文革的半经历者身份，对有意无意故意歪曲、妖魔化文革的许多谬误，没有识别能力或识别能力甚差，以致随声附和，以假做真。他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结果，却真假掺半，谬种流传，遗害无穷。这当然不能怪他们。”

那么，聂树人在北大武斗这件事上，算不算“以假做真，谬种流传”呢？在他自称“为了历史真实”的书里出现这问题，不怪他自己，又能怪谁呢？■

【评论】

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辩

聂树人

一、朱成昭是文革第二英雄

聂元梓无疑是文革第一英雄。但是，在1966年6月1日文革正式开始后，她已经成为“过去时”。她是文革前的“造反派”。当毛泽东批发了以她为首的七人大字报以后，她在文革大潮中，就身不由己地倒向了工作队¹，倒向了她作为“既得利益者”一员的“权贵阶层”。此后，她是在矛盾中挣扎的。以毛泽东对她的支持，她应该是造反派；以她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骨子里，她应该是保皇派。正如朱成昭在1967年2月4日所言：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

在北京的文革中，特别是1966年至1967年，北京地质学院一直走在文革队伍的前列，是北京文革的领头羊。

唐少杰一直非常推崇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他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无论是在文革的实践上还是在文革的理论及其思潮上，清华大学的文革都是富有典型意义和典型特征的“活化石”。我认为他说得片面了。

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一些人，对“地质东方红”从来不服气，认为“北航红旗”才是北京文革的“老大”。我认为，这也不符合事实。

1966年7月26日晚，在北大操场的“辩论会”之后，聂元梓在哪儿？蒯大富在哪儿？韩爱晶在哪儿？只有朱成昭等回到地质学院，于7月27日凌晨写出了向工作队开炮的大字

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报。

接着，“东方红战斗大队”（8月8日）和“东方红公社”（8月17日）先后成立。战斗大队和公社的领导机构叫总勤务组，负责人都没有“官衔”，叫勤务员和总勤务员。

——8月23—24日，朱成昭率领“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向工作队的派出者和决策者“请愿”，要求工作队给自己平反。经过绝食斗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等被迫同意到地质学院听取意见。斗争取得胜利，这一“反潮流”行动，当时震动北京和全国。自1949年以来，还没有如此庞大的队伍敢于到国家部一级单位去“请愿”。

——9月5日，“地质东方红”二次进军地质部，要求地质部党组和工作队给自己平反。

——9月6日，“地质东方红”不能参加“一司”，又不愿意参加“二司”的情况下，朱成昭主导的“地质东方红”总部决策，由外联组组长周永璋等出面串联，成立了平民的“三司”。

——9月23日，进行了院广播台夺权和校内夺权。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夺权成功。此举掀起了北京高校夺权斗争的风潮。

——在上述活动的推动和促进下，10月6日，由三司主持，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掀起了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高潮。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对大会表示强烈的支持。从此，造反派才站立了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才从北京燃向全国（10—12月）。

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生死大搏斗的时期，是文革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文革最重要的时期。如果以1966年10月为界，对此前和此后的文革“比重”加以比较，似应各占一半。10月之前，是文革要不要搞的问题，是文革“依靠力量”（造反派）生死存亡的问题。10月之后，是文革如何搞的问题。同10月之前相比，10月之后的文革之路，已经是“一马平川”。

在北京，以上这些活动，都是以朱成昭为首的“地质东方红”带头完成的。可是，在这个期间：

——蒯大富在哪里？到9月之前，他在清华大学站不住脚，还在东躲西藏。9月之后，由于“地质东方红”的大力支持（让他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出头露面，“地质东方红”的数百人两次到清华去支持蒯大富），他才开始在清华站住了脚，才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到9月下旬，才成立了有几十个人参加的“清华井冈山”。

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还说，蒯大富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¹，根据何在？文革之初，造反派都受到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队的镇压，这一点，蒯大富与朱成昭处于同一等级。只不过蒯大富的“对手”是王光美，朱成昭的“对手”是邹家尤。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婆，妻以夫贵，她的“对手”蒯大富也就“贵”起来了。而邹家尤虽为副部级干部，官可能比王光美大一点，只因“背后”没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因此，邹家尤的对手也就“贵”不起来。

但是，以政治对手的“贵”而贵，只是个表面现象，而且，那是“不自觉”的，被迫的。真正的“贵”，在于自己怎么干。从7月27日至10月初，朱成昭就干出了样子。不仅“地质东方红”干得有声有色，还伸出手来，拉了蒯大富几把——救他于危难之中。究竟谁“贵”？

依据这些事实，能得出蒯大富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的判断吗？显然不能！

——“北航红旗”在哪里？据许爱晶写的《清华蒯大富》：“8月20日，我们对工作队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²这就是说，“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成立，比“东方红战斗大队”晚12天。在“地质东方红”“一进地质部”（8月23—24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北航红旗”才于8月25日，步着“地质东方红”的后尘，进军北航工作队的派出单位国防科委。这只能说明，“北航红旗”是跟着“地质东方红”走的；或者说，它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3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²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40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是学着“地质东方红”走的？

——韩爱晶在哪里？据韩爱晶自己说，他是8月25日到国防科委“请愿”的那部分人的一个负责人，不在学校，更没有主持全院工作。直到1966年10月4日，韩爱晶才成为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¹而这时，文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由此，同朱成昭相比，韩爱晶能提到桌面上吗？

据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朱成昭是在“文革要不要搞”的时期，叱咤风云的；蒯大富，包括韩爱晶，是在“文革怎么搞”的时期才逐渐“出名”的。而且，他们搞的大都是“极左”活动、沽名钓誉的“出风头”活动，比如“智擒王光美”、到处伸手夺权、“消灭4.14”；大搞“红海洋”、“揪、打彭德怀”等等，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蒯大富、韩爱晶在文革中的作用，能与朱成昭相比吗？如要比较，则朱成昭是座山，蒯大富和韩爱晶只不过是山前的两个小土堆。

在这个期间，文革第一英雄聂元梓有什么贡献吗？她是工作队的大员，没有受到镇压，当然也谈不上“造反”。在毛泽东指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后，她不得不拼命清洗沾在她身上的工作队臭气，同时，却又将她的“工作队立场”贯彻到底。

与朱成昭相比，此时的谭厚兰，是“平常”头头一个。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朱成昭是北京文革第二英雄。

据此，看看北京的文革格局，唐少杰在说清华大学的文革是什么“典型”，是什么“活化石”时，该不该有些口涩？

二、成立“二团”，本意是另起炉灶

招致朱成昭垮台的政敌有四。一是地质部的当权派及工作队，二是地质学院的保皇派（“斗批改兵团”一红卫兵及其所属地质学院文革委员会），三是“东方红公社”内部的反对派，四是其他人。

¹ 同上。

到1967年初，前两类人都被打垮，反对派成了他的主要政敌。

反对派主要由“二团”构成，参加的八个人都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积极分子。因为种种原因，或在“东方红”中失意（周永璋等），或与朱成昭有不同意见（蔡新平），而于1966年10月，成立了各有四个人的“二团”。

“二团”因为在反朱成昭上的一致，故相对于“朱派”，称为“蔡派”。

“二团”对自己的估计较高，他们在不同日子里，先后成立两个团，大有同朱成昭叫板之势，大有“一呼百应”之盼。在那个时期，确有一些“另立山头”者成了气候。可是，不曾想，二团的旗帜先后举起来了，领头者一个是曾经的“东方红公社”政治部主任，一个是曾经的“三司”负责人，名头大得很，可是却没有人响应，一个人都不来参加；不仅刚成立时不参加，直到经过近两年后，“校园文革”结束，仍然只是8个人。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有能力的人，也只能顺着时势的潮流走。

1966年至1967年的事实证明，“二团”的成立宗旨，矛头首先是对着朱成昭的，而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定位背逆了广大东方红战士的方向，必然使自己孤立。

有人可能觉得我的这个看法太武断。那么，大家想一想，在1966年10月，地质学院是不是贴出过一张由二团的人写的著名的大字报《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将东方红搞垮了（搬开了），朱成昭不就垮了吗？在那个时候，地质学院的绝大多数人对“东方红”是有感情的，因为是它，带着大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正在夺回由保守派掌握的地院大权，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时刻，反对朱成昭，“搬开东方红”，是不是“别有心机”？至少，这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

进一步想，两个“团”既然目标一致，却为何各打旗号？连八个人都联合不起来，怎么能使人相信，跟着他们走就方向正确？

对于地质学院的大多数学生、教员、干部来说，不论是谁，只要能领着大家朝正确方向走，大家就跟谁走。那时，朱成昭的方向正确，为何要另易旗帜，跟着别人走呢？

看到这个形势，反朱派也只好悄悄收起与“东方红”分庭抗礼的念头，等待另外的时

机。

三、朱成昭的“八大观点”

当“东方红”在地质学院一统天下之后，朱成昭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是点滴积累的，且有个过程。有时，朱成昭也会自己的思考说出来，同他的战友探讨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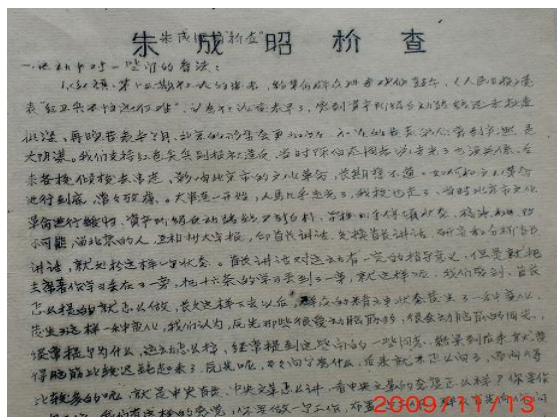
不过，他的战友中，可能有“异类”，或者有“不经意的乱说者”。很快，他的思考被他的“冤家对头”知道了，就被上纲为“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足可坐牢的大罪。

由于“二团”大肆炒作，还给中央文革写告密信，从而招致了陈伯达对朱成昭的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不得不于2月4日，以检查的名义，将自己的观点全盘端了出来。¹

现在，我将《朱成昭检查》的全文登载如下。

资料来源：1967年2月4日《朱成昭检查》的录音，由当时“红教联”的一个战斗队录音并整理。原件保存和提供：宫保军（宫保军还是朱成昭检查大会的主持者）。



（上图：“朱成昭检查”录音稿的复印件，开头部分片断）

一、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1. 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²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加好。社论的发表我们感到突然，是大阴谋。我们支持红色尖兵到报社造反，当陈伯达同志说走光了也没关系，后来各校倾校去串联，影响北京市的文化革

¹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第370—383页，2011年。

² 1966年《红旗》十三期社论的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本刊编者）。

命，长期想不通。如何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常常考虑。

大串联一开始，人马几乎走光了，我校也走了。当时北京市文化革命进行缓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新反扑，学校几乎停顿状态，搞斗、批、改不可能，留北京的人，互相抄大字报，印首长讲话，交换首长讲话，研究和分析首长讲话，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首长讲话对运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把主席著作学习丢在了一旁，把十六条学习丢在了一旁。就这样呢，我们感到，首长怎么提的就怎么做，长久这样下去以后，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们认为，原先那些很爱动脑筋的，很会动脑筋的同志，经常提个为什么，运动怎么搞，经常提到这问题的一些同志，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脑筋比较迟钝起来了。原先呢，事事问个为什么，后来就不怎么问了，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中央首长怎么讲，看中央文革的态度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做一个工作，布置一个工作，群众首先向你问的，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文革同意不同意这样做？你要是讲这次工作中中央文革不知道，那要布置下去呀，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阶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当中，逐渐产生了奴隶主义思想，不爱动脑筋的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就很难发挥。因此，那一阶段普遍出现了群众感到没有事可做，要等待总部的布置，而自己就很少主动地去找工作，主动去寻找事情去做。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革命的创造性就发挥的很不够，等着总部的通知，等着总部的布置。总部呢，也等着中央文革布置。一层层下来，有很多同志不愿在北京干，东方红的一部分同志都不愿在北京干，希望到外地去，有刚从外地回来，看到学校里边没什么工作或没什么事，也就跑到外地去了。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在我们思想当中，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们东方红中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一个社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我们的想法

提交中央文革后，接着东方红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后，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找去了批评了我们。批评里有那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¹，有些过火，因为我们抄红卫兵家过火，就这点批评是正确的。²第二点，就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就在这种形势下，在以后，我们在作工作当中就感到有所压力，我们感到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工作上头犯了错误，而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总部几个人来说，依赖性上也是大增强了。而自己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和我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2.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揪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和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掉刘邓路线的根子，这点是本质的根本的东西。因此，在怎么样批判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召开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不应过多，当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排得很满，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处于很空闲地位。他们参加这个大会听听发言，呼呼口号，有的呢，为了去看看首长，有的是为了去看看黑帮，这样大

² 此句中的“如抄红卫兵的家”原文如此，注1的标号也是原文所有，但没有注释之内容。询此文作者，未果。特此说明——本刊编者。

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

我们认为这种大会是造声势的一种方式，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方式，应该是次要的方式，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而这一点应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当时提倡大批下工厂、下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我们当时发现了工厂形势很紧张，斗争很激烈，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打先锋，可是，我们发现了在知识分子里边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就感到必须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个方法，就是大批的下工厂下农村，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刘邓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子，才能把我们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在批判刘邓路线上我们的看法。

3. 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一个黑帮分子，揪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比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说明了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揪这些人比较轻松，大家觉悟都高了，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察觉，保守派力量小了，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对某些人物过早地定了调调，有些人刚刚被揪，刚刚出现了几张大标语，要揪他出来，而另一派正是处在死保的时候，两派一个是保一个是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让群众在斗争中分辨那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一方面是错误的。应该让群众充分辩论透，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家尤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

但是在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而是一揪基本上一揪，中央文革就说，这个人或者不是，是么，大家就一起来斗，不是大家就放掉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后来呢，有作法，有人，那基本上群众就没揪，文革小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样更加不利于教育群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使群众在斗争当中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群众真正来掌握毛泽东思想，要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扎下根子，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要这样将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有人能起来造反，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假如这一点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揪出那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刘邓路线的推行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比较本质的一部分就是

我前边说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文革小组在那阶段的作法是偏重于把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刘邓路线的推行者和顽固执行者揪出来，而对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让群众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支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让群众通过斗争来掌握马列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子，彻底挖掉每一个人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注意的不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注意不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在以后揪一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很被动的局面，今天文革说保的，过了一天又说把他揪出来了，造成了很多被动场面。随着两长路线斗争的深入，在去年12月份刮起了一股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黑风，这股黑风当时留在北京的人大家都知道，都能回忆得起来。这场风，这股黑风的来势是相当猛烈的。关于揪和保的问题，同志们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马列主义者何必去保，我记得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报告，在报告里讲了这样一句话，（老农妇）有个农村的老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马列主义者，你还要保什么呢？我感到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去年12月份就刮起了这股黑风，在反击这股黑风过程当中，有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根据16条（我说这些看法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的规定，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人要加以逮捕法办，对这种人必须逮捕法办，非如此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当时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中间有人讲问题）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我们认为李洪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像李洪山，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

样就教育了群众，将有很大好处。相反，当时李洪山在学校斗争了一次以后，就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把他弄回来斗争他，所以，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并没有批倒批臭。这样是不利于教育广大群众的。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主席也说过一个学校出几个蒋介石分子没关系嘛，做反面教员嘛！何必先把他抓起来，可以摆在身边，也可以跟他辩论，叫他摆摆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到底怎么好，把他批倒批臭，这个好嘛！另外，对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的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他在这里边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确实他的立场是站错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狮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派方面，哈军工造反派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认为这种作法压制了群众，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应该批评的，但是抓到监狱去，对群众当中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妨碍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哈军工写了大字报的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文革小组呢？在这个问题上作法我们是有不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当时的观点。

4. 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

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

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需要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而在三司里面有学校，在三司一部分组织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当时就给我加上了分裂主义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想不通的。

实际当时的三司，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个很快的大发展，由于组织发展工作上方的问题，不严密，由于原来的二十几个学校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实际上三司里边也有组织已经不是革命派的组织，混进来的，当时必须重新整顿左派队伍，重新纠集左派队员，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我们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

关于这次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我们讨论过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完全赞成大联合大夺权，当时在一些具体作法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看法：第一关于大夺权，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守派夺权，同时还可能引起革命派队伍内的互相冲突，这样来搞乱革命派的阵营。

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过程中，我们认为黑帮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犯有路线性错误这里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已认识到错误的人要加以区别，不应该一样夺他们的权，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

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为什么道理呢？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联合的主体以工人、农民，而这个主体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这个先天不足性一方面北京市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就是比较差，北京的产业工人很少。（2）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受了彭真黑帮的统治，受压迫、受压制得很厉害，一般的运动有多次的反复，所以工人一定不敢说话，所以北京市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

动起来比较晚的，而北京市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北京的工人运动，它的几个总部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人造反总部，还有个造反联络站。这几个总部是怎么成立的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一批人搞总部的这一批人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先跳了出来，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人，另外一批人有些人确实确实是彭真黑帮的小爪牙，被打成反革命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趁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站了出来，而跳了起来。跳起来以后，他们首先就弄了一个大印，什么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或者革命造反总部，搞一个大印。然后呢，到市委、总工会或到市里去要它几间房子，就打起了招牌。然后，他们分头到各个工厂去发展他们的实力，招兵买马，也不管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反正他们下去就发展实力，招兵买马。这样使北京市工人运动大联合本身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

另外，北京农民运动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也有个别的几个地方起来了。（3），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你比如说，上海有两派势力，就是一派要攻市委，一派要保市委，在这个斗争过程自然形成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保守派的大联合，在斗争中本身就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攻击这个省委或攻击这个市委，一个保这个省委，一个保这个市委，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派力量的大联合。在北京没有这个斗争，没有这个全市性的大搏斗，也没有一个全市性的共同目标。所以，北京市的大联合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这个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决不能搞合二而一，决不能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和抹稀泥。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5. 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北京中学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到一个闯将的作用，尤其在破四旧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闯将。但是，后来北京市的中学运动冷落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些小闯将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联动的成员呢？而其中有些很著名的闯将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这个问题我是考虑了一番。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跟一些中学生，很多类型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们认为在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问题，这就是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关键问题，一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点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就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没有解决好，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处理好，这是矛盾的焦点。

我们认为这个对联在初期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尤其对北京这具体地点来说。北京长期在彭真修正主义统治下，他搞了一套资产阶级路线，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歪曲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的强调重在表现。所以，当时中学里出现这副对联，在初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可横扫一下这条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这个初期就必须大讲阶级分析、阶级出身，非如此就不足以打倒修正主义阶级路线，非如此，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所以这一段是需要的。但是这一段不能太长，到了一定时期就必须扭转，必须指出这副对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对中学生，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段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

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得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

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压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大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

另外，我个人有这样看法，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没记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选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现在在一些中学里面，在一些窗子上和门上都写了“小太阳坐牢房”这种标语。在监狱里，一般晚上就唱那个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有十多岁的有些十多岁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人呢，很多和家庭断绝关系，自己单独干（以上根据录音记录稿，以下根据笔记记录稿——刻印者按）。联动已认识大方向错了，对三司有意见，希望文革（小组）谈一谈，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争取了一些西纠派。现在联动有三万多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小孩写红卫兵日夜想念毛主席，应关心他们，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6. 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7. 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

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8. 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二、我的思想过程

从大串联后逐渐形成，到“12月黑风”，大联合、大夺权，我认为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有赶快结束运动的想法，准备打大战。我们不想出大字报，如果不是要打仗，我们就有如下打算，就打了一些电话，要求中央文革单独接见。第二，打算印传单，写大字报，但王大宾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根本办法，当前许多群众不动脑筋，要更深入发动群众，大家都能起来造反，影响大，可能要将运动推迟五个月。因为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法请求军委谈谈国际形势，因为没谈，也未写成。大字报只起了个头，开始题目叫：“我们要造反了”。第二次题目改成“东方红总部造反声明”。并没有写完，是表态性质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要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我们没有给中央文革写过信，当时想，这个大字报出了以后，影响会很大，“保字号”会乘机造中央文革的反，我们还要保中央文革。

陈伯达批示下来后，我认为比薄一波的批示还厉害，什么也没干，糊里糊涂打成反革命。晚上开会也没去，发展到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地步。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蒋良朴说：

“这个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重。”

三、我的错误实质与危害性

1. 我把自己仅作为革命动力，而未作为革命对象。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阶段，错误认识了大民主与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2. 大字报、传单问题，虽然有好愿望，但客观上帮助了错误路线和敌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没出来，影响还小，否则，影响更大。

3. 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由不相信群众到害怕群众，不能把思想露给群众，而两次避开群众。放弃了总部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工作。

4. 我的错误影响了“东方红”的威望，使我们的战士遭到保守派的围攻，遭受毒打、游街。使受东方红支持的左派组织遭到保守派的反扑。

5. 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6. 在整风中，我们强调抓一小撮，抓托派，提法不恰当，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压制了群众。把一些同志当成托派，感情上与同志们对立。在此，向“东方红”战士承认错误。

7. 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对错误认识是缓慢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欢迎战友们提出诚恳批评。

朱成昭检查完后的情景是，全场鼓掌。这就是表示，检查可以通过。

张海涛（后来的革委会常委）此时上台即席讲话，对攻击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人予以批评，因为朱成昭并没有“炮打中央文革”。

此后，绝大多数东方红战士坚持，朱成昭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依据的正是“朱成昭检查”。

1966年5月，江青还叫朱成昭“归队”，更说明，朱成昭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这就是事实真相。

四、朱成昭是否受彭德怀、叶剑英等人的影响？

“朱成昭检查”以后，发生的事另当别论。详见我的回忆录《地质东方红兴亡史》¹。但是，蔡派并不接受（朱成昭没有反对中央文革）这个事实。因此，从1967年初到21世纪初，一直将朱成昭视为“阶级敌人”。

朱成昭等在1980年前出狱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背景下，也大肆炒作他们当初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还说中央曾有人提议，要将他们树为“反对中央文革”的典型。因此，朱成昭在谈及自己的“五大观点”和“八大观点”时，就不惜“加油添醋”，改变1967年初他的言论和看法。

朱成昭死后，有人在肯定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这个定论之后，还进一步推测出他反对中央文革的背景：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通过叶向真，受到叶剑英的影响，等等。无论是1967年，还是21世纪的今天，朱成昭是否“反对中央文革”，既不能以蔡新平等人的观点为据，也不能以朱成昭后来的说法为凭。唯一可以作为根据的，是他1967年2月4日晚的“检查”。

从《朱成昭检查》中，能看出朱成昭受彭德怀“万言书”的影响？能看出朱成昭受叶剑英的影响？

朱成昭是否会受他人影响，人们尽可以猜测和分析。但是，就我对朱成昭的了解，朱成昭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用戚本禹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

朱成昭最可能受到他人影响的，是他的父亲在1967年初受到冲击。

依据《朱成昭检查》，他连中央文革的话（他当然知道，中央文革的背后站着毛泽东），都要通过自己的脑子，思考一番，更何况当时不在台上的彭德怀、叶剑英的话。

¹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386—39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

五、朱成昭成立“新东方红公社”的失败

朱成昭的失落，大体开始于1967年3月初~4月初。证据有二：

1. 戚本禹（加上谢富治）在3月5日凌晨，代表中央文革，对“地质东方红”新领导班子的认定，和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的谈话。

2.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的成立。领导班子中，没有朱成昭的名字。

3. 1967年5月初，王大宾得了江青让朱成昭“归队”的指示，和我一起，找朱成昭谈话。¹至于“归队”还是“不归队”，这是朱成昭的问题；“往哪儿归”，这是中央文革的问题。

朱成昭说出“往哪儿归”，说明他并不拒绝“归队”。

我的看法是，如果朱成昭愿意“归队”，他就得向中央文革写个检查。检查得深刻不深刻并不重要，关键是对中央文革的“忠诚”态度。他已经在全院大会上作了检查，再写个检查并不困难。如果再写个向中央表示“忠诚”的检查，中央是会对他做出恰当安排的。可是，他没有写。

显然，朱成昭的心胸狭窄了些。在朱成昭的眼里，半年多来，他是地院的第一把手。地院革委会的成立，王大宾当了第一把手，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一句“我往哪儿归”，说出了他的绝望。更重要的是，他瞧不起王大宾：一是，王大宾以前是他的部下；二是，王大宾是告密者（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采访）。在他看来，是王大宾将他的“八大观点”告诉了中央文革，才招致了他的下台。他的这个看法的直接根据是：中央抛开他，而起用王大宾。

就王大宾说来，交出地质学院第一把手的位置，而让朱成昭上台也有困难，因为他上台不过一个多月，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或者，他会不会认为，让朱成昭“归队”，就是取代他的“另一种说法”？由此，引致的结果是，王大宾的耐心有限，说出了“你愿意归就

¹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46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归，不愿意归就不归”的话。

谈话的结果只能是，朱成昭“不归队”。

朱成昭认为，中央既然要他“归队”，这就意味着中央没有忘记他，还要起用他。可是，从5月等到7月中旬，两个多月没有动静，他等不及了，他要行动了。他的判断可能是，中央起用他的前提是，得靠他自己。他的自信，这时害了他，驱赶着他向新的目标前进。他在密切观察、分析社会动向后，决定筹划成立“新东方红公社”。行动的日期就定在1967年7月20日。

不容怀疑，他从“东方红”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才不过几个月。他的人脉还在，影响力还有许多。已经有了一批紧跟他走的人，如蒋良朴、刘万恩、黄瑞华、郑文卿、陈广智、胡乐成、梅建明、万惠祥、张华府、张华清等。曾经的“东方红”核心组成员，现革委会常委朱德瑜，他也可以叫去问话。

朱成昭可能想到了一年前他起家的“顺利”。一张大字报，就奠定了他成为“东方红”第一把手的基础。这一次，也应该胜算在握。

可是，这一次，他错误估计了形势。即使紧跟他走的人中，如黄瑞华，也会有保留。黄瑞华当时负责广播台。胡乐成要黄瑞华开广播机，黄不开。胡自己开了，《新东方红公社宣言》还没有广播完，广播机就被关了。胡乐成也被人“扭送”到革委会问话。¹“新东方红公社”胎死腹中。朱成昭没有从中总结出应有的教训，而是错误地认识到，他不可能在地质学院“归队”，也不可能在中国“归队”。

他绝望了。

他与“二团”的负责人一样，方向错了——他们都在为个人的权势利益而奋斗！而众多“地质东方红”战士却仍然在为文革的胜利而奋斗。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何名人、伟人，如汪精卫、陈独秀、张国焘等等，在大到“国事”或小到“校事”、“家事”的问题上，如果定错了方向，或判断错了行动的时机，都

¹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467-46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将落得一败涂地。也可以看出，“机会”和“机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着万丈深渊。

六、朱成昭的“不归路”

雄心勃勃的朱成昭没有“归队”，他当然也耐不得寂寞。在他看来，在校内的路堵绝之后，要想有作为，就只有出国。当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缅甸）的“革命事业”搞得很红火。一些红卫兵就去那边发展了。他想出国，是不是想到越南去“抗美”，到缅甸搞革命，不得而知。

他与叶向真和其他一些同学于1967年7月下旬到了广州，住在军区。他的出走，随即被公安部发现。于桑副部长与我院宫保军一起，从广州将他带回北京，交给地质学院。

此后，朱成昭被批斗，并受到调查。

大概是一个月后，朱成昭被逮捕了。

我的看法是，朱成昭的被捕，与文革的形势直接有关。朱成昭等人被逮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底、9月初，正好发生在王力、关锋倒台的时候。此时，文革“转向”，毛泽东抛弃造反派，朱成昭首当其冲。朱成昭等先是关在秦城，后是去了湖北宜昌的劳改农场……

在1980年前后，朱成昭被平反后，被分配去了江苏省地质局水文队。后来，他受单位派遣，到上海搞基础工程项目。搞了一阵之后，他独立出来，自己建立公司。可是，主要因为他与多个女性交往，被骗被坑，到1997年前后，他的公司破产。他重又回到北京，想对文革进行“回忆”。宋永毅、牛小涵等曾经采访过他，他也带着他们采访过其他人。不久，死于昌平十三陵。■

【述 往】

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唐振权

反右运动以后，我曾立下决心远离政治，任何政治运动绝不冲锋陷阵，不入党，不做积极分子，在政治洪流里随大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却鬼使神差地卷入到漩涡里，违背了自己的信念，致使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还惹出来了一些麻烦。但是我也觉得有莫大的愧疚，我自认为也没有做过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觉得做了一些无意义的事，真不如闲呆着，还觉得有一点上当的感觉。我是怎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呢？也是从随大流开始的。

1966年8月后，地质学院里成了“地质东方红”的一统天下，学校里已经风平浪静，大批的学生走出校园，在市里到处煽风点火的去点火，去外地革命串连的去串连，学校里基本上是空巢。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的特点之一，就是播音大喇叭喊叫不停，煽惑着气氛，张扬着声势。我们系里的一个我很熟的学生政治辅导员，他在“东方红”总部，一次见到我对我说：“你到广播台去帮一下忙，编审一下稿件。现在学生都走了，不能没有广播的声音，每天用不了多少时间，早中晚把广播响起来就行了”。我到了广播台一看，编辑、播音、机务全都是教师和干部，全面替代了在广播台里的学生。我们在那里确实事情不多，基本不需要自己写稿，只是把“东方红”学生送来的通讯稿，编辑修改，有时候需要誊写一下，便于播音人员好认识。多数的情况是广播通知，或者是转播电台的新闻、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文章。老师们到广播台值班以后，大喇叭里没有了激烈的战斗的檄文，也没有了声嘶力竭的口号呐喊，不像学生红卫兵那样，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我们做到的也就是让校园里不能沉默无声，要有一些革命的气氛。做到这一点也倒并不难，到时候打开广播机就行了。有广播稿就播广播稿，没有稿件就转播广播电台的声音，哪怕就是放放革命歌曲，

也就可以了。

我在广播台也就一共待了三个多月，直到1967年的春节过后，广播台里的学生们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广播台，都回到我们原来的系和科室了。在广播台的日子里，基本上是起着个看守值班的作用，我自认为没有直接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没有成为舆论宣传的狂热吹鼓手。而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作为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回到教研室后不久，“东方红”负责宣传的学生头头直接找到我说：“中央文革和新北京市委，决定五大院校的红卫兵小报，可以公开对外发行，专门供应我们新闻纸，在大报社里排版印刷。我们要重组编辑部，加强《东方红报》力量。原来编辑部都是学生，现在需要一些老师进去，保证小报的质量，也请老师们帮助把关，不要出现重大原则性的错误，请您也能参加帮助一下。”学生说得很客气也很诚恳，我也推辞了一下，说我也没有搞过报纸怕胜任不了。他劝说我没有关系，说学生们更没有搞过，不也搞出了几期了吗？大家一起动手慢慢就行了。真是盛情难却，我也就勉强答应，试试看吧。这一试就是真真切切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了。

我后来检讨自己，虽然我不愿意卷入政治，但是我看到那么多人在文革开始时受打击，被镇压，我也非常压抑。突然的形势翻个，也有被解放的感觉，像是获得了自由的心情。压抑的情绪有了舒缓和释放，自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参与的热情。这不是政治的狂热，而是错误地认为，今后不再会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一定是自由解放的世界。因此怀着感恩的激情，所以心甘情愿地为文化大革命而献身。

大约是1967年的3月底，新扩大的《东方红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议，来了约有二十人，学生和教师干部各占有一半。学生原来有四五人，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多是涌现出来的写大字报的好枪手，教师和干部分别来自政治教研室、党委宣传部和各系，当然都是笔头过硬的“笔杆子”。“东方红”总部负责宣传的学生头头聂树人是会议的召集人，他先介绍了一些情况，《东方红报》已经出了五期，前两期是油印的，从第三期改成铅印，在学校

的印刷厂印的，从第六期起我们将要到正规大报印刷厂印刷，固定印刷日期，每周两次，要保证按时出版，不能延误。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需要分成两班，每周各负责一期编辑出版。他希望老师们能帮助把好关，不能出现任何大问题。我们和其他四家，清华、北大、师大、北航都是一样的，不要落后于人家。他讲完了，我提出意见，编辑部仍然是学生负责，到上面开会，对外交涉和联络，还是学生们去出面。这个意见得到所有教师和干部的一致同意，学生们也没有异议。我们还表示，可以每天都来编辑部，按时上下班，至少来看一看有什么事，学生的编辑们除了负责人不受这个限制。就这样，我就算正式的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制造工作。

《东方红报》被安排在《前进报》排版印刷，《前进报》原是报人王芸五的《大公报》，和香港《大公报》同属一个老板。大陆不许私人办报，1956年以后改成名义上是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前进报》，文革开始后就停办了，文革后复刊改称《经济日报》。这里安排了三个学校，除了我们还有清华和北航，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个晚上都排满了。

发稿排版的当天晚上，责任编辑在校吃完晚饭，七点多钟骑车赶往报社。报社在城里和平门外虎坊桥，骑车过去大约一个小时，八点多到了报社，把要发稿的稿件和版样交给检字排版师傅。我们去的三四人当时就在那里，完成一校、二校，直到正式的报纸大样出来校对完毕。这中间报社的专职校对，还要负责校对两次。出来的报纸是和正规报纸完全一样，不会出现文字和标点符号任何一点错误。我们在大样上签完字，全部工作就算完成，此时已是午夜零点多了。夜深人静可以飞快地骑车回到学校。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印好的报，去车拉回学校。

负责发行的也是一大堆人，基本上都是院机关的人。除了校内要留一些分发各单位和各班级外，其余的都要销售出去。一小部分报纸组织机关人员包卷，交邮局寄给订户，和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其余所有报纸组织学生到市区街头叫卖零售。价格相当于一份晚报的价钱，我记得是5分钱。那时《北京晚报》也停刊了，红卫兵小报很好卖，学生带出去的报纸很快就卖光了。从成本来看，我们每次印两万份一点也不亏。除了纸张钱和印刷费，没有其

他开支，所有的人力费用都是无偿的。发行组收回来的钱，直接交到院财务科。

《东方红报》从1967年4月正规印刷出版，到8月份“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共四个多月，出版发行了50余期，被勒令停止，寿终正寝。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销声匿迹，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北京的五大红卫兵小报，为什么能批准正规印刷发行？还特别供应新闻纸。到底红卫兵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红卫兵小报对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红卫兵小报随着学生红卫兵造反起家，首先是控诉和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控诉刘少奇工作组的残酷斗争，揭露原北京市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而是矛头对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小报和大报遥相呼应，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第二，红卫兵小报能够传递不能公开的信息。中央文革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召集红卫兵头头一些讲话，或是传达某些精神，不便于公布，那么就可以通过红卫兵小报透露出来。这些上级领导调节红卫兵派别间的矛盾，申斥某些红卫兵组织的过激行为，暗授某些机密行动，也可以从红卫兵小报给出一鳞片爪的信息。更有甚者，中央文革里的某些关键人物例如康生，讲出的某些“经典”观点，表示了他们核心理念，这些都渗透到红卫兵小报字里行间。康生讲，革命不是目的，是手段，无产阶级要达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民主、自由也不是目的，只是口号，用这个口号来鼓动革命，也是手段。康生还说过，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不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无产阶级要达到最终目的，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方针，修订自己的策略，甚至不惜废除自己早先制定的政策。康生把这些理论讲给红卫兵头头，再传达到这些办报的人，目的无非是向小报编辑们灌输极“左”的思想，为文化大革命可以随意践踏宪法，践踏民主寻找理论根据，贯彻到红卫兵报的宣传里。

第三，红卫兵小报是鼓吹个人崇拜和造神行动的最好帮手。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对毛泽

东个人崇拜，神话毛泽东，是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动力，也是文化大革命宣传的核心内容。当然这些主要是靠林彪及中央文革等人的讲话，中央宣传工具的大造舆论。但是也同时依靠充斥街头的红卫兵小报，大力地帮腔鼓噪。红卫兵小报最先喊出，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小报不论怎么过头的言论，也是那些造神行动的幕后者愿意看到的，为造神运动添砖加瓦。这种鼓噪看似荒唐无聊，实际上也是文化大革命火热气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喜欢看到人们对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更喜欢的是，把他当作是伟大的神，当作当今唯一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领袖。红卫兵小报所起的作用是公开宣传所不便于做的，因而功不可没。

第四，红卫兵小报是红卫兵动态的风向标。通过红卫兵小报的窗口可以洞悉红卫兵的动态，红卫兵的倾向，在红卫兵的报纸里可以观察到的红卫兵思想和情绪，上面那些决策者就可以摸到红卫兵的脉络。我认为他们不怕你谩骂闹翻天，如果走向冷静和理智那倒是可怕的。例如，1967年的夏季红卫兵小报已经不注意斗、批、改的宣传报道，热衷于宣传全国一些地区的血腥武斗。宣传动乱，宣传丑恶，隐蔽地反映着青年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夏季以后，红卫兵小报愈来愈表现得没有生气和活力，反映着青年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厌烦和理智。我觉得这些正是促进了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派出“军宣队”“工宣队”，终止了红卫兵的时代。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小报也随之结束了它的命运。

我亲身经历了将近五个月的“东方红报”的编辑工作，深切的体会到了上述的四点，红卫兵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也愈来愈觉得《红卫兵报》是被利用，自己已经是很深地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我仔细地盘点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实感到了是为虎作伥，干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的做了，不能不说是被愚弄和上当受骗。那时候虽然感觉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正常，但是也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与灾难。我反思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那样，像一个忠实的卫道者去摇旗呐喊？我既不是思想单纯的小孩子，也不是想拼命向上爬的投机分子，

更不是极“左”思想坚定的维护、执行者。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干得那么起劲，除了开始时的一点感恩激情，我觉得还有可能有某种深层的动机，就是隐约地不自觉地干着一点“做游戏”和“搅屎棍”的恶作剧。

大部分做编辑的学生、教师和干部，应该说都是一些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他们最初对红卫兵报的热情是好玩，轰轰烈烈尽情的发泄，顺着文化大革命领导者们的口吻，呐喊狂呼，时间长了自然厌烦泄气。红卫兵小报在后期，越来越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愿望相反，不是在做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帮倒忙搅浑水，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们，感到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不能得心应手，而是麻烦不断，不听指挥。于是这些决策者们看到了，红卫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若再利用下去，不但不能起到他们所想的好作用，反而会成绊脚石，当然对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我认真地想了想，《东方红报》以及我到底都做了哪些“做游戏”和“搅屎棍”的事情呢？大概有以下这些：我主持了《东方红报》很有特色的杂文小栏目。除了讽刺和挖苦一些“走资派”的官僚作风外，更多的是派性的暗斗和讽刺。讽刺聂元梓是燕园里的老佛爷，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不能容下一起揭竿造反的兄弟们；讽刺蒯大富是忘恩负义，忘了自己曾经受压逃到地院，寻求支持的狼狈境遇；讽刺那些造反英雄，有枣没枣三竿子乱打乱反，矛头指向“三名三高”，是农民狭隘平均主义；调侃“校园里的游戏”，讽刺北大、清华等学校里的武斗。我们曾在小报上大骂“苏修混蛋”，强烈抗议苏联警察在莫斯科红场，殴打中国留学生，撕毁留学生们手中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后来我们被《人民日报》报道，遭到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

《东方红报》在后来的各期连续刊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篇学生们编写的大事记，如实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事件的过程。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倒“三家村”开始，继而是揭开“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北京市委的盖子；再而是北大的“第一篇大字报”，刘邓的镇压革命的反动路线；然后是翻盘，刘少奇被打倒，成立红卫兵组织，掀起“造反”高潮；社会上“破四旧、立新风”，

揪斗走资派；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学生全国革命大串联；以后是上海“一月风暴”；中央的“二月逆流”；全国各省市大夺权，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

《大事记》也记述着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一批批地被打倒和揪斗，最初是北京市委彭真、吴晗、刘仁，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始是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继而是几个副总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来又是刚调到中央就被打倒的陶铸、陶鲁笏，再就是一大批叛徒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军队里最先揪出的是“土匪”出身的贺龙，军事压倒政治的教条主义分子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然后又是打倒军队中主管政治工作的肖华、刘志坚（还是参与写出《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纪要》的主角），然后又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到了1967年7月，江青身边的御用文人王力、关锋、戚本禹，也当作变色龙、小爬虫被揪了出来。

《大事记里》还记录了一批没有公开点名的很有影响的人物，受到革命群众的批斗，有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陈毅、谭震林等，甚至是涉及到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受到军事院校革命派的大字报批判。《大事记》里也记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四旧”破坏文物、古迹、庙宇、古建等的恶劣行径，《大事记》也揭出了社会上的打、砸、抢的罪恶。那末这个“大事记”是对文大革命胜利的歌颂呢？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述，从而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混乱？难道这不是“搅屎棍”吗？在后来清查“5·16”分子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们没有一个人指出《东方红报》这个“罪行”，实际上他们也不敢指出这个“罪行”。

还有，《东方红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各地的武斗，更是发表过长篇报道广西、湖南，四川武斗的残酷和激烈。提供报道的都是专业记者，报道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人们看热闹，看到混乱的局面。另外还在一些文稿里透露着河北、山东、云南等地动用枪械的武斗。能说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给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抹黑吗？这么说《东方红报》和其他的红卫兵小报，起着“搅屎棍”作用一点也不假。可以看得出来，决策人当初设想的发动群众，特别是让青年人来推动狂热，必须改弦易辙了，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以上都是我很久以来，对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的反思得出的看法。我们虽说起了一些与文革领导者的愿望相反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主观上没有任何“韬晦之计”，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胆略。事实上是起了“做游戏”“搅屎棍”的效应，的确与那些年轻人也包括我们一些老师，没有了热情，想着赶紧退场的情绪有关，与主张办红卫兵小报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搞到那样一个局面，不能不使一些有头脑的人，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我在《东方红报》的后来一段时间里，还做了一件事情，花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一天我在编辑部里，一个同学带着外校的一个学生进来，说是有一份《毛主席诗词注释》的手稿，问我能否帮助印刷出版。我问那位外校的同学怎么回事，他说他是师大中文系的，他们有一个编写小组，编写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注释，自己没有印刷出版的能力，请求我们帮助印出来。他说：“我们同学们都信任地质东方红，委托我过来找你们，我们希望能印得好一些，你们一定能做得到。”我说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稿子，如果可以，我们一定帮忙。他把稿件留下，我仔细的看了一下，确实不错。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了很多的版本，比较了他们编写的，注释还是很细致认真。他们特别注意了，每首诗词写出来时候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此时的心绪感情。我觉得这本诗词注释写得不错，还是很值得印刷出版。于是一两天后那个师大的同学再来的时候，我就承诺了我们可以帮助印刷出版。那时候也没有订合同一说，我们就是口头上确认了相互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负责初校和二校，我们完成三校和终校。他们提出他们要求的印数，我们给出一定数量的免费数目。我们保证最好的印刷质量，配上丰富的插页。双方同意不署校名，只写诗词编写小组，扉页上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印”的字样。这是一个互相高度信任的一个口头协议。

我所以愿意揽下这件事，一是后来的《东方红报》，确实也没有了多少事情，学生们已没有了开始的热情，报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多余品，我就也是应付差事；二是毛泽东的诗词确有很大的魅力，我对毛泽东作为诗人还是非常钦佩的，我很愿意做这件事的；三是人们一定会要这本书，这是一个热门需求。因为这些，我还真是不遗余力地跑成了这件事

情。

我先是找好了排版印刷的厂子，选好了新华印刷厂二厂，稿件直接让师大的同学送去，他们正好就地去负责清样的校对。然后就跑新华图片社，选择毛主席的有关照片，诗词手稿的影印件。诗词中一些相关的风景照片，再联系了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制版印刷了彩色照片的插页，又联系了外文印刷厂黑白照片插页的印刷。还联系了北京商标印刷厂印制了烫金的塑料封皮。全部印好，我仔细的校勘了一遍，由印刷厂推荐跑到河北燕郊，在一个乡镇装订厂确定了《诗词注释》的装订工作。装订的样书出来以后，认真地做了检查，真是非常满意，也难怪各个单位都是当作一类图书下达任务，保证了各个环节没有一点差错。因为我打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名义，又因为这是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一路绿灯通行无阻，从确定到出书大约花了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完成了。我也向师大的同学兑现了全部诺言，皆大欢喜。我已经记不得印了几万册书，很快就全部销售一空，连留下的几十本样书也都被人要走了。

印刷《毛泽东诗词注释》这件事完成之后，不久“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开始了整顿和全面接管学校的工作，组织学习，清理思想，清理阶级队伍。当那些宣传队员们看到我们所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想索要和购买时问到我们，我们说一本也没有了。他们问到能否再印，我说还要重新联系，只要原版还保留就可以。我又得到特别恩准去专门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完全参加教研室的学习，有事去办打个招呼就行了。又是跑了几个月，这不像先前了，有学生帮手，现在干什么事到需要自己亲自去干。不但这样，还给我派了一个跟班的，名义上是帮我的忙，实际上是监督我，就连去财务科开支票，办公室开介绍信都要自己办理，他真是跟着我给我拎包。

以前到各印刷单位，凭着“东方红公社”的介绍信办事很顺，现在拿着院革委会的介绍信，倒是官腔十足，办事并不痛快。这次我又只印了几千本，反而拖了三个多月，当然人家嫌印得太少，所以不爱搭理。我无权决定印数，只能央求说好话，人家才接受订单。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才印刷装订出来，印出来的我全部交给了工、军宣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干得非常憋气，真是不痛快，费了很大力气完成了，没有落了一声好。我像是在被管制下，带着“镣铐”去干完这件事的。

我就是这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并不想出风头，也没有想捞到什么好处，但还是做了一个文革中的积极行动者。然而我也不后悔，我毕竟看到很多东西，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领悟了一些事情，也认清了中国的现实。我也没有什么愧疚，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欠下什么债孽。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无形比有形更多，我们所失去的最好时光是无法弥补的。由此而牵连的后来的清查什么“5·16”，更是冤枉之极，滑稽之极。这积累起来的怨恨，不能不全都发向文革的始作俑者，我无法高呼“伟大！正确！”后来心境虽是平息了下来，但是一回想起来那些，心灵不免还是被针扎似的刺痛。■

此文选自唐振权先生的《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一书（2012年，北京，自印书）

【书摘】

《王大宾回忆录》 摘选

王大宾

八、周恩来叫我改名，毕业分配去了四川；换了马甲别人就放过你了？

(173—181页)

2. 周恩来主持清查“5·16分子”运动。我换了马甲，照样不放过我

前面说过，1967年6、7、8月，北京出现了一股背离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思潮。更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刘令凯，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等人为头，成立了一个成员不到20人的“5·16兵团”，公开炮打周

总理。对这个一小撮人组成的“5·16兵团”，炮打周总理的行为，北京高校各个造反派组织，都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反对和坚决反击。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还带人抄了“5·16兵团”的活动窝点，将抄收的材料都报送了中央文革，并将其首要分子扭送到公安部门收押。

那段时间，我正在小汤山医院住院治疗。1967年8月14日早晨，我在医院内散步锻炼时，发现医院内大字报席棚上竟然张贴有转抄的反周总理的大字报。这可是大事，我立即找到医院的负责人追查此事，并要他们马上覆盖这张转抄的反周总理的大字报。

回到病房，我立即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汇报社会上出现反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并表达我们地院东方红全体红卫兵、地院全体革命师生、干部，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决心。写好信，我就给地院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派车来医院有要事处理。不久，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就到了医院。我向他讲了情况，要他负责组织追查反总理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对一切反总理的行为活动坚决予以反击。同时要他将我写给周总理和邓颖超的这封信，马上直送国务院周总理。聂树人立即回城照办，将信和有关材料送到了国务院。8月18日下午，我就收到了邓颖超的亲笔回信。用的信封是用全国妇联用过的旧信封翻面粘贴作成的。这种处处厉行节约的艰苦朴素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一直珍藏着邓颖超的回信原件。在1978年4月29日，在华国锋等人签字抓捕我时，被他们从成都地质修配厂我的家中抄走，至今也没有归还我。我想这封信的原件，现在可能应保存在武汉市中级法院有关审判我的案卷材料中。好在，收到邓颖超的回信，我就向地院革委会成员传达了，当时许多人都有抄件。现将他们保存的回信抄件照录如下：

王大宾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对我们都很关心，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

感情，真使我们感动。我们也希望你利用这次疗养机会，好好治疗，早日回复健康，尽早重返战斗岗位。

特此专复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我们红卫兵群众将其扭送公安部、被谢富治批准关押的“5·16兵团”的头头刘令凯、张建旗、程镇华等人，不久就被周总理下令释放了。我记得，当时，周总理在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讲话，说起放人这件事时，大度地表示：“我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就要抓人家，这不行。是我下令将他们放的。”我们当时都对周总理的这种宽容大度表示无限的敬佩，亦天真地认为，“5·16兵团”已被打垮清除，“5·16兵团”问题已成过去。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我换了马甲，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改名王毅，毕业分配到四川一年之后，我这个曾经坚决反对“5·16兵团”的人，一个对周总理效忠、得到总理特别关照的人，反总理的“5·16分子”的大帽子，竟也会强加到我的头上。

事过境迁。时至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5·16”反革命集团，对清查“5·16”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全国性的清查“5·16”分子运动就此展开。运动初期即以追查“5·16”组织，追查填表宣誓发展的“5·16”分子为重点。追查一个完全因逼、供、信而搞出来的，被扩大化的虚构的“5·16”组织的运动，很快就陷入僵局，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打破僵局，继续推动与扩大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1月，周恩来说：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查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为。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抓住几件事就可以”给造反派头头与骨干扣上“5·16”分子的帽子，关押审查，我自然在劫难逃，换了马甲也是跑不了的，躲不了的。

1971年3月9日，军宣队李凡茂等人派专机到成都，将我从成都地质修配厂抓回北京地院关押审查。这一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的未婚妻古宝琳，这时亦从地院毕业分配到了成都地质修配厂，原准备1971年5月1日结婚，婚礼正在筹备中。不料祸从天降，3月9日将我抓走。那天凌晨，当我被抓押上汽车时，古宝琳紧追过来，强忍眼泪，痛苦地目送我离去。我紧贴车窗口见到此情此景，不知此次分离何时才能相见，心似刀割。

我被抓住的几件事，最大的一件，且“罪行确实”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军宣队指控我和王大来一起，与彭德怀密谋，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从四川揪彭德怀回北京。而东方红公社在其小报上，不加批判地全文登出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就是别有用心为彭德怀翻案制造舆论。

军宣队抓住我的主要还有三件事：（1）指控我与杨成武、傅崇碧关系密切，支持军队“冲派”，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林彪，企图让杨余傅上台；（2）指控我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接见时，在江青批评我时，顶撞江青，说江青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反对攻击了江青；（3）指控地院东方红参与了1967年7、8月发生的“揪刘火线”活动，是围困中南海，揪刘是假，是幌子，目的是要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总理，要揪出周总理，让刘、邓上台。指控我在地院保护了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就是证据。

吴法宪旨意，1971年3月9日，军宣队李凡茂、刘永珍“奉旨”用专机将我从四川工厂抓回地院后，就把我关进了他们在地院私设的牢房，铁栏、铁门，严加看守。在这私牢中，我被关了近二年之久，期间车轮战，不让休息，不断逼我承认反对总理，并参与组织了地院反总理的“5·16”组织。对他们的指控，我是坚决地反驳、抵制、对抗。而为制造一个所谓“地质学院5·16兵团”大案，他们不但关押了我，还长期关押了地院许多无辜的师生。张海涛、李贵等人在劫难逃可以理解，连高元贵、王焕也要被打成“地院5·16兵团”的黑高参，可见其荒唐！

他们为了制造大案立功，公开的逼供、诱供、串供，软硬兼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竟成为他们逼人就范的卑鄙手段。一方面，他们树立所谓的从宽典型，用高音喇叭对着关押我们这些死硬分子的私牢，不断地播放某某人的坦白交待材料，地院水文系教员专案组长朱思贵、董荣金等人亲自炮制的所谓材料，放贾振远的交待，思想如何从不承认是“5·16”到承认，后又“翻案”，又“承认”的转变过程的录音。另一方面，又放处理“抗拒从严”典型的大会录音给我们听，不但放校内的还放校外的。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的头头敖本立，作为“抗拒从严”的典型，在71年5月31日财贸口群众批斗大会上，被宣布公开逮捕的大会录音也放给我听了。还放了一个卫生部副部长的录音，和北师大批斗谭厚兰的录音。

朱思贵、李凡茂给我训话说：“除了聂元梓不是‘5·16’外，所有的大小头头都是‘5·16’。”原张海涛专案组长朱思贵说：“你住的这个房子，原是张海涛住的。他出身也很好，你是知道的，一个贫农孤儿，14岁参军入关的解放军小战士，顽固到底，临到逮捕他之前一天，他还说，他不是‘5·16’，说以他的党籍担保，地院不存在‘5·16兵团’，不要搞无辜的师生们呢！现在好了，关在牢里，头发长得很长，后悔了，你别走他的老路。逮捕张海涛那天，李贵跳楼摔断腿了。唐威正也当场吓得站不住了。陆炎德识时务为俊杰，他承认了，学习班也没进，地院‘5·16’的盖子就是这样揭开的。已一年多了，你现在不要顽固，没好下场的。”

对他们的这一套，我不为所动。我对他们说：“外校的情况我不知道。地院的情况，我知道，贾振远录音中讲的是假话。地院根本不存在‘5·16兵团’，我不是‘5·16’。李贵、王焕、高元贵也不是，地院各级革委会的成员都不是。你们千万别上当，把问题搞错了。”

关在他们私设的地院私牢近二年时间，不给我放风，不准我晒太阳，也不准我去医务室看病。前后开了我几十次大小批斗会。最难忘的是1971年10月和1972年春节，两次押我去地院江西干校批斗的情形。我的老师宋祥彦已被关押460天，也是一个“死顽固”。春节前夕那次批斗我的大会，也将他押上台陪斗。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见又拉宋老师陪斗，他的爱人刘照明老师上台发言，劝他承认了吧。并说：“小牛牛（他们四岁的儿子）很想你回家过年。牛牛说，爸爸你就承认是‘5·16’吧，你就能回家过年的。你承认了吧，为了小牛牛。”刘老师声泪俱下的发言，让我有撕裂心肺的痛。四岁的小牛牛的话，叫爸爸投降，承认自己是“5·16”。也许是小牛牛的话，太刺痛了宋老师的心，被朱思贵称为“臭狗屎”的他，为了小牛牛，违心地承认是“5·16”了。“5·16”冤案就是这样制造的。因“5·16”冤案，地院李思田老师被逼用电自杀未死，李明哲老师长期被关押批斗，逃出到山上吊死山中。李明哲在被关押在地院江西干校，两个月后被上山农民发现，正是冬天，尸体已开始腐烂，目不忍睹。朱思贵们说，李明哲是畏罪自杀。被迫害自杀的还有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

抓我“5·16”，还株连到我无辜的亲人和乡亲。我的未婚妻古宝琳是我大学同系同学，是学生会优秀干部，从小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但我当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当地院革委会主任，并没有安排她担任过任何职务，她什么事也没干过。只因她是我未婚妻，他们就不放过她，也成了抓“5·16”的重点清查对象，多经折磨，几乎将她整死。

我的妈妈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山沟里的妇女，懂什么“5·16”？他们追问、审问她时，可怜的妈妈说：“我虚岁刚过五十，还没有五十六。”真是天大的政治笑话。

我成了地院红卫兵头头，没有给家乡的任何亲人带来过什么“好处”。“福不连人祸连人”。当时担任县商业局长的舅父，照样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舅母和我的母亲照样被打成保县委的“老保”遭受打压。而因抓我“5·16”，全部亲人都受到牵连。他们说我家乡德昌县是我的老窝，将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一些干部全当成“5·16”来整。为此，德昌县办了一个名叫“王大宾学习班”，将40多位干部抓来办“五不准”学习班。不但我当商业局长的舅父首当其冲被关押，我少年、青年时的小学、中学的同学，甚至我光屁股时的放羊、放牛娃娃伙伴，也受到迫害，要他们交待什么“5·16”问题。这个抓“5·16”的冤案，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株连九族！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而亡。地院军宣队的头头牛润五、李凡茂、赵钊等人，因是吴法宪控制的空军政治学院派出的骨干，也受林彪事件牵连被抓。人们都对我说：“王大宾呀！林彪完蛋啦，你少了一大罪状啦。”抓我“5·16”的人被抓了，抓住我的反林彪罪行没有了，莫名其妙的是林彪又成了“5·16”的总后台。而整我“5·16”一切照旧。朱思贵们总是正确。1972年3月，朱思贵们押我到已迁到湖北丹江的学校批斗。当时我正发高烧，专案组有邵锡昌老师提出不同意批斗的意见，朱思贵们根本不理，坚持召开了批斗正在病中发高烧的我。

1970年，北京地院外迁到湖北荆州江陵。空政学院军宣队头头出事后，改由湖北省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派出荆州军分区政委李德清和刘庆芳为首的军宣队，接替空政学院的军宣队，继续依靠朱思贵们坚持其制造的地院“5·16兵团”冤案。地院人人自危，四分五裂，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到1972年12月28日，国务院、地质部军管会，只得请出原高元贵院长出任地院临时党委书记，来湖北收拾残局。这时我也从地院私牢转移至湖北江陵的学校，继续隔离审查。

1973年元月，已被关押两年之久、蒙受冤屈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且已病重，路都不能走了，不知何时就会失去生命。为了留下遗言，把历史的真相告知中央和群众，告知后人，我写了七条内容的“严正声明”，交给学校军宣队领导李清德、刘庆芳，并请同情我

的老师准备回京后写成大字报贴出，要贴一份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办公室门口。我还托人到江陵邮局，挂号邮寄二份我的“严正声明”给吴德、丁国钰和湖北省的张玉华等领导人。而朱思贵们拿到我的“严正声明”，又给我扣上攻击伟大的“批清运动”，攻击“宣传队”的罪名，以此整我斗我。时至1974年夏天，朱思贵们又背着我，不将他们写的关于我的所谓结论材料与我见面，就上报了北京市革委会。其上报材料内容还是他们抓住的所谓几大罪状：对抗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为彭德怀翻案；反江青，只是去掉了反林彪这一条而已。搞了好几年，用尽了心机手段，“5·16”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到我的头上。对地院清查“5·16”运动，以高元贵院长、王焕为首的地院临时党委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北京地院也没有一个‘5·16’分子”。但整人的人，抓“5·16”有功的朱思贵等人照样升官重用，无一人因此被追责。这就是政治。

时隔三十多年，2004年，吴德在他的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如是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

为了把所谓的“五大领袖”拿下来，就要在全国搞一个批清“5·16分子”的运动，制造一个涉及千万人的大冤案？吴德的说法，应是回避了制造这一大冤案的幕后真相和这一运动的主要推手与责任人。但我要谢谢吴德的是，他承认，他们查了几年，也没有查出将我定性为敌我矛盾的罪行证据。但他不敢承认整我为“5·16分子”是错误的。他更不敢承认，以逼、供、信，将全国千万人打成“5·16分子”的所谓清查运动，是文革运动中人为制造出的最大的一个冤案。

九、陈云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182—185页）

1. 邓小平、陈云执掌中共中央后，我由“5·16分子”变成了“反革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等人联手，抓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这时人们又都对我说：“大宾呀！江青们完蛋啦，压你头上的大石头落地啦，你该彻底解放啦！”

当时，我还留在李世忠教授领导下搞人造金刚石钻头研究，等待北京市委吴德他们给地院指示。在湖北地院的我，也是这么期盼的。如何处理我没有结论，我就不好回工厂。

政治上幼稚天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重新上台、实际执掌了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邓小平、陈云等人是决不会放过我的。1978年4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向我宣布：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我王大宾。随即我被戴上手铐，关进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民主路415号位于蛇山下的湖北看守所。抓我前一天，我还在武汉地院、汉口地校实验室在地院李世忠教授领导下搞地质部下达的人造金刚石钻头研制，已搞了一年多了。

我被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央，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其所依据的“罪行材料”，亦如吴德在其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入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湖北、武汉的公检法部门对我的处理，完全是奉命行事而已，决定权在上面，他们只能照办。

看到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执掌的中共中央，在处理文革运动中红卫兵问题上：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对我在文革运动中的表现完全了解、而时刻为我的命运担忧，已与我结婚生子的古宝琳，心中的不平是可以想象的。不平则鸣。1980年1月，为上面对我不公的处理，她疾笔而书，投函国务院信访部。回复自然不会有。今天将这信函照录如下，还会有意义吗？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所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蛮横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的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会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中国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1980年1月

2. 陈云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判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对已在看守所关押四年多的我，负责处理我的问题的湖北方面内查外调，正如前面所述吴德的说法：“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过往中央已定我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证据罪行，实在不好对我定罪判刑。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七处周处长和负责我专案的徐科长对我说，他们刚从北京回来，专门去为我事。他们对我说，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聂、蒯、韩不一样，你安心等待结论，不用急。一直等不到。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专案人员，又通知我，他们到北京找中央汇报请示后，回到武汉告诉我：“对你的问题，有人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云。他们做我的工作，要我顾全大局，要我理解不能不对我也进行审判。他们还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且保证量刑时会区别对待的。

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政治！■

【资料】

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

1966. 09. 23

关锋：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戚本禹：错了就改嘛。

关锋：对！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

戚本禹：（没记上。）

关锋：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听取意见（按：指九月五日起“东方红”公社到地质部请邹，而邹却溜回地质学院，不去地质部），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怕学生呢？听听有什么要紧，听听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按：指九月二十三日地院发生的严重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一斗、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当然，这里的情况我知道的也不多，但这点是肯定的，邹家尤应该和他们（按：指“东方红”方面的同学）见面，至少他没有把他们的话听完。就算是错误的话，也要听完嘛。

戚本禹：你们看，是否把扩音器安一下（按“东方红”要开批判斗争会，“红卫兵”等方面不给扩音器），你们负责安好，用完你们收回去。

红卫兵：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他们自己安，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戚本禹：大家都在这儿，你们安，你们收，还要什么借条？

红卫兵：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

戚本禹：你们有困难，我们不勉强，就算了。

关锋：没有扩音器也一样开嘛。我们过去打游击也没有扩音器嘛。

戚本禹：你们的红卫兵是否也参加批判邹家尤？

红卫兵：我们可能参加，因为今天早上九点钟直到现在还都在紧张地斗争。已经很迟了……。

戚本禹：你们要是怕累就不参加好了。人家也是战斗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吗？干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们相信你们大多数还是好的。你们看是否去广播一下，让大家都来参加，实在不愿意来就算了。你们现在去把喇叭装一下，大家的财产要大家用嘛。

关锋：大家的财产是为大家服务嘛！

戚本禹：对，为人民服务嘛！

红卫兵：我们要说清楚，他们已经抢了很多广播器材……。

戚本禹：大家的东西嘛，怎么能算抢呢？他们又不是外来的强盗，怎么叫抢呢？大家东西嘛，广播器材是你的吗？

红卫兵：当然不是我的。

与关锋、戚本禹同志来的另一位首长：你们去安一安吧，这个会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们叫你们安的。

红卫兵：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这里，“东方红”的领导人也在，大家都听了，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

戚本禹：你们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后，归新的文革。但是今后器材要为两方面服务，既广播你们的，也广播“东方红”的，不就没事了吧？

关锋：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和同学见面是不对的，他们到地质部去是正确的，他要是见了他们，就不用等十几天了。

戚本禹：你们的文革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是不是

不欢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你们要是实在不愿意和我们见面也就算了。

红卫兵：我们不是院文革的，我转达一下吧！

关锋：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的，你们的院文革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是给院文革写的条子，为什么他们不来见我们？陈伯达同志的批示你们广播了吗？

戚本禹：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做观察员的，陈伯达同志的批示你们广播了吗？

红卫兵：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批示，若是有的，我们一定广播。

戚本禹：刚才不是有很多同学抄了吗？让抄了的拿出来让他们抄一下。（“东方红”方面一同学递出批示的抄本，红卫兵代表抄了一份。）批示全文是：兹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同志到地质学院做观察员。陈伯达，9月23日

戚本禹：你们两个，一个负责安喇叭，一个和院文革转达一下，我们请求见他们。

（红卫兵代表出去后，稍停，北航“红旗”的一名战士找关锋同志汇报情况，关锋同志很关心他们，问他们：“你们学院原工作队长赵如璋接见你们没有？”并表示：“赵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见你们是不对的。”后来又有北航的另一派意见的人，对关锋同志说他和“红旗”方面的意见不同。这时一位“红旗”方面的战士过来说：“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滚蛋！”关锋同志马上解释说：“不要这样，让他把话说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话说完嘛！”紧接着）

关锋：赵如璋为什么不签名呢？为什么十几天不见面呢？

那人：我认为对待一个军人，这样不对。

关锋：我认为是对的，要坚持大方向嘛，你们回去想一想。

那人：反正我们有点想不通。

戚本禹：你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的这些话主席早就讲过，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得很清楚，这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不怕群众的。

关锋：别说一百个，就是十个群众让他去，他也应该去。他是工作队长，整了同学嘛。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11）。

【资料】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 09. 28

我们相信持有不同意见的两部分同志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红卫兵、赤卫队是这样，对“东方红”也是这样。

现在我看是严重的分歧，我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想一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大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只看你骂过我，我骂过你，这不怪群众。

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到底怎样呢？十六条公布后，群众是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在十六条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十六条公布后，是不是都执行了十六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结束了？也不是。就是有极少数人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利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农民斗学生，这在社论中不宜多说，讲的这样深刻，因为还有外国人。今天，这是相信大家是革命的，我可以跟大家讲，现在确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那么极少数人，用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更隐蔽的方式，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斗革命的群

众，他们这样做是好事，更暴露了他们自己。在十六条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十六条公布后还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坚持搞鬼，这和十六条公布以前就不一样，性质就不同了。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们也希望越少越好，我们也希望邹部长不犯这样的错误，这只是一般而论。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才能很好的贯彻十六条，不破不立，我们几个赞成这样做，要批判。路线错误是什么错误呢？路线错误就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左派，制造了一个“反干扰”阶段，打击给院党委提意见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赶工作队的。当时很早起来赶工作队是对的，应该给他们平反，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文革组织的领导。在二十几天的“反干扰”中，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舆论，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这不管用，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些问题包括邹部长，千万不能认为对我有激烈意见的人不多，自以为得意，那就糟糕。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在“反干扰”中积极反的，不要他们作检讨。但必须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坚持错误的路线，那就很危险。

据我了解，在新市委和工交口所属单位所派出的工作队和所属学院的问题是严重的。例如：清华、师大就是这样。北师大工作队队长撤了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当然也可以。

我认为最近邹家尤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东方红”的人去地质部，你跑了，十几天不见面，群众要你见面，你去嘛！你为什么不敢呢？你怕群众。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呢？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怕群众呢？落到这个可悲的地步。群众要求提得高，要求罢官，可以提嘛。我前几天讲了四点意见，不是也有人提要罢我的官吗？我说可以，怕什么呢？为什么和学生站在对立的地位呢？群众的冲突，在同学中造成严重的隔阂，要由工作队负责，由地质部负责，由邹家尤负责，你不见面嘛！火越激越大。

你们整理了材料，就可以说明这是敌对情绪，为什么有些材料不写呢？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为什么不出面？而你的女儿在那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群众打了人，骂了人，都不怪群众，我们可以相互谅解，最后责任根源由地质部负责。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检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听到冲突，我们是很着急，你邹家尤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你为什么不说：“错误是我犯的，你们要打就打我。”有的就做得好，虽然也犯了路线的错误，但十六条公布以后就做得好了。

邹家尤部长讲做一面派不做两面派，希望你是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和另外一派住在一起？这不但同学有怀疑，我也有怀疑。造成这样分裂局面的根源在那里？我看不怪“东方红”几个人，也不怪红卫兵几个人，应怪地质部。过去造成这个局面，现在又造成这个局面，邹家尤付部长应该痛心，不应对那些同学抱敌对情绪。

王焕，你是一个党委书记（地院，刚任一年），一个共产党员，你也应有一个明朗的态度。一个大电台、一个小电台，你为什么不能管起来？但相互不要骂，不要骂狗崽子，以后从口头上取消。广播台可以安排一下，每人一小时。印刷，你也应该能负起责任，双方应该平等。传单也不要骂。骂解决不了问题，有不同意见要说服。吃饭问题，你应该管起来。车的问题，你也应该管起来。不然，你还怎么叫党委书记呢？你还算不算数呢？要有原则的争论，不搞无原则的纠纷。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我是不了解，看到这种现象，我们是很不满意的。越闹起来分歧就越大。

院文革我建议你们也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吸收他们参加。你们写来了一封信表示支持我和戚本禹同志的四点意见，是不是支持？接到你们来信的同时，也接到了好几封信，也有讲道理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也有骂的，当然不要紧。

今天在座的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心口如一，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当面怎么说的，背后也应该怎么说。今后再发生冲突，首先要邹家尤负责，其次是王焕。王焕同志，我们宣布的四条你赞成不赞成？你以前是什么态度？你们应和他们睡在一起，吃

在一起，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能坐山观虎斗！如果是在后面挑拨群众，站在后面坐山观虎斗，那么迟早会被群众揭穿的，别看现在有些同志看不清，总有一天会揭穿。

邹家尤，你应该首先到“东方红”那里去，你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也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我对两部分同志都没有气，我就对邹家尤有气。为什么没有气？同学中这样冲突为什么不难过？如果没有你的错误或你把错误向大家讲清楚，能按十六条办事，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冲突了。你必须讲清楚，要对意见大的讲清楚，也要对意见少的讲清楚。

要告诉工作队，千万别以为多数派赞成我们，就得意，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看不清是一时的，多数是会起来的，不会跟错误路线走。谁在后面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他自己倒霉！同学不要互相赌气，要互相谅解，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好好讨论，通过讨论会取得一致的。

我还建议从根本上考虑一下，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光要看到地院，也要看到兄弟院校和外地的情况，你们不是看了地院和外地的传单吗？毛主席不是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联系起来好好想一想。真正要革命的犯点错误也不要紧，没有经验嘛！要按主席指示办事。

我看不要谈你伤了几个人，我伤了几个人，眼光要放大些，心胸开阔些。我就先讲这点，我想听听邹家尤、王焕讲一讲。■

来源：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第二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11）

【资料】

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 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

1966. 10. 03

(林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接见了北航红旗战斗队、地院东方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部分同志)

亲爱的红旗战斗队的同志们：

我代表《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向你们问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们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我们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红旗》杂志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陈伯达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但我们还有缺点，诚恳地希望你们多提意见，贴大字报和批评。

这期社论（六六年第十三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写的。同志们，你们学习得很好，我学习得不好。我念一段林彪同志在“十·一”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我们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这里我再念一段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开的。公报是毛主席亲自参加写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小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我再重复最后一句：“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我不妨在此念一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英明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他们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通过钻进共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占有的老阵地，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夺取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占领的阵地，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合乎历史规律的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既然是挖一切剥削制度、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就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法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甚至打着“红旗”

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识破他们，并且要更加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使敌人的阴谋在广大群众日益觉悟的情况下永远不能得逞。

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仍是“怕”字当头。他们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离开十六条，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搞宗派活动，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制造一部分工农群众反对革命学生，造成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一些局面。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混水摸鱼。我们对于这些人本来是好心善意地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就会脱离人民，结果就必然会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全会公报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我们要自觉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去回答和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坚决地捍卫和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捍卫和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我们就是遵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写的，如果说这篇社论是对的，那是林彪同志指示的结果。如果不对，那是我们《红旗》杂志社同志的责任。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林彪同志指示。以上是对社论的说明。

最后，同志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五敢精神，同志们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你们一心一意捍卫十六条、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惜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特别要学习的是同志们

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来源：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11）；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资料】

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

1966.10.09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副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探矿机械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所需要）

(五) 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卞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另外，李富总理还交给我们找地质部所谓黑帮谈话的权利。) ■

来源：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11），
《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资料】

阎长贵接见北京航空学院 及北京地质学院代表时的讲话

1966.10.12

筹委会、院文革执行了原来的工作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来受打击，后来又继续受到压抑的少数派日子不太好过。当时，你们反映了许多情况，国庆节庆祝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和两个社论都是讲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敲锣打鼓来报喜，另一种是对社论不理解，来问问题。这个《红旗》社论的威力可不能低估，威力是相当大的。在九月初，有一个学校也反戚本禹，以后又反他，还要“罢他的官”。一百多名同学等在接待站一定要接见，我跟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去了。在那里我们被围攻得很厉害。十月四日我回《红旗》编辑部的时候，他们碰到我，直向我道歉，说要支持过去反工作组的同学。

……形势是非常好的。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了誓师大会，从党中央到中央文革小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以外，其他都去了，那次也没这次去得全。江青同志在那天大会上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讲话。这样大好的形势是不容易得来的。你们是经过艰苦的斗争的，实际上不仅你们进行了斗争，上面也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的。这是路线的

斗争，反映得多高多深刻你们都知道，你们心中有数。

谭力夫才二十多岁。作了那么一个讲话，很多地方大量印发。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总是代表中央意见的吧！也印不到那么多的份数，为什么这么印？不仅是大学印，而且是中学、机关、基层单位翻印，现在这个讲话流毒全国，这是为什么？印总是需要吧，有的人说那个讲话也不错嘛！我说那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么大量地印发谭力夫的讲话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需要，否则干嘛印这么多？谭力夫背后是有人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谭力夫的讲话很使我们动脑筋，不仅少数派，即使多数派也感到奇怪，不可理解。

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很复杂。十六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三期红旗社论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出现了一片很好的形势，威力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充分利用好的形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唯一的办法是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去做。掌握稳政策，就是江青同志讲话中最长的一段话。在当前保持好的革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按那段话去做，那我们经过斗争和上面的斗争而得来的好的形势就会失去。所以我们确实要按党的政策去做。

如何对待维护工作组的那一部分同学呢？《红旗》社论实际上是批判他们，他们说的是不对的。我们每一个红旗战士，每一个东方红社员都要考虑，怎么对待他们，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考虑。现在社论出来以后，他们心中都是有考虑的，他们内部在分化，他们内部在造反，这应该说对我们是大好形势，我们应该考虑，怎样使我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向错误路线开火。他们应该展开辩论，看看方向是否正确，不正确的造反，就分裂出来了。现在有些人分化出来，但是原来的多数派说他们是叛徒，反工作组的一派又说他们是投机分子。这样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没法了，出来不出来都不好。现在就是要热烈，热情地欢迎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方面来。过去爱国是不分先后的，这是打个比喻，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并且站过来，这很好嘛！要热情地欢迎他们改正错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讽刺、打击，这样不好。你们过去不是受打击、迫害的吗？这样的态度对待同志是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大部分的同志是革命的，是要革命的，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群众，他们是受了蒙蔽，应该欢迎他们在斗争中改正错误。社论中说把矛头对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学生中有的只是个别的。绝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是要革命的，我们要抱热情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歧视、打击的态度，不要说他们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我认为不能这样叫，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这么叫太伤人了。有人要人家总部解散，我们不要叫人家解散，修正主义的总部，下令叫他们解散也不行，更不能采取压制办法，搞搜查。关锋、戚本禹同志也叫我来说，不要搜查。这样做是要上当的。

实际上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希望我们这样做，把大好的形势变坏，要提高警惕。敌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欢迎我们把大好形势搞坏的。我们欢迎的是革命的乱。敌人也欢迎我们的乱，不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做是要上当的。我们过去受打击、迫害、整我们，我们今天不能反过来搞他们，搞同学。他们是在工作组的挑动下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要把罪名加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身上，不要集中在同学身上，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你过去骂我，今天我再骂你，这不能说是针锋相对。你们不能去计较这些。要把仇恨集中在错误路线身上，不要集中在同学身上。如果你们叫了“修正主义红卫兵”解散人家总部，那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不同意你们这样做。我们同意你们的大方向，但你们过激的做法我们不同意。否则你们脱离群众，我们也跟着你们脱离群众。做法要得人心，争取群众这是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很善于团结群众，毛主席受打击、迫害很多，可是毛主席仁至义尽，王明直到八大还是中央委员，这不是王明个人的问题，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很重要。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一定要好好领会这句话。我觉得江青同志的讲话主要就是政策、策略。不这样做你们怎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只有把同学争取过来才能肃清。北京工业大学最近团结搞得很好。《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的威力，你们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们公开承认了错误，多数派同学真正哭了。

上面对你们的估价是很高的，你们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不要往领导脸上抹黑，使他们不好说话。你们看看毛主席、林彪同志是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在一部分人，他们也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他们把责任往上推，把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也看做受害

者，我看各人有各人的帐都要算。但只能一个一个地算，先从那里算起，我看还是先从工作组算起，上面也要负责。你们从具体入手容易争取群众，你攻他，他就要交待问题，集中一点，就是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没有群众斗群众的意思。

社论指出：一小撮，可是如果不好好理解，就可能引起群众斗群众，被人抓小辫子，首先集中到工作组身上。社论威力很大，谁愿意公开和社论对抗呵！你们姿态要高，肚量要大。有许多人他们是受了装骗，谁都害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现在要讲策略。主席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述很多，你们可以认真地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你们不注意，搞几天形势很快就搞坏了，我们是不会拆你们的台的。我们不会给你们出坏主意。不仅要搞好地质学院，而且要搞好地质战线。没有群众大多数是不行的，怎么有利于争取群众，你们就怎么做，我们应该用政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去争取他们。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要好好讨论，那段话很重要。是经过斟酌的。按那段话办事，形势很快就会好转。团结也不是和稀泥，那些同学一时受了蒙蔽就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也不好受。

关锋同志说，我们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叫他们（指错了的那部分同学）很难办。青年错了就错了嘛，错了就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话就是练习造反，我们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来源：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伏虎游击队

【读者来信】

1. 朱德瑜纠错

《记忆》145期，地院文革专辑（一）中，发表了《地质学院里的文化革命》一文，此文的作者是地院的一位老教师，他的名字应为“唐振权”，贵刊误为唐国权。请更正。■

2. 阎长贵指误

《记忆》149期白磊关于陕西文革的文章，第14页有两处时间有误。1、说毛1966年7月18日就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对。这话是他在该年国庆节时说的（见同年13期《红旗》社论）2、说7月24日下午，北京召开了各高校代表大会；不对。这个大会是7月29日下午召开的。

《记忆》150期，第9页说林杰是《红旗》副主编，关锋是主编。关锋没当过主编，他1966年4月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陈伯达从《红旗》1958年一创刊就是主编。林杰也不是《红旗》副主编，他文革中任哲学组组长，曾主持过一段《红旗》的编辑工作，但没有副主编的名义。第14页，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时，没有同时“令戚本禹停职检查”。王、关被隔离审查就是戚本禹把他俩送到被隔离的地方的（钓鱼台2号楼）。戚本禹是1968年1月被关押起来的。■

3. 宋翔雁、刘昭明谈如何回忆历史

《记忆》147期收悉。我们认为，对所有的文革参与者来说，在回忆那段自己曾今参与过的历史时，特别是在评述那段历史时，应当让自己超脱出来，不要仍然拘泥于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处事原则，更不要夹带个人的好恶和恩怨。要用人性的、理智的、法制的等文明社会的处事原则来观察和思考。否则，仍然停留在当时的自己和环境来回忆和思考，

那将是停滞的、封闭的。说难听一点，就是毫无长进，死抱着陈旧的去而不能自拔了。回忆的目的不是讲故事、更不是炫耀自我。因为面对人类文明而言，文革是丑陋的、残忍的，无论是对被打倒的干部，还是被整饬的无辜群众，即使是那些被忽悠而加害于人的，都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我们回忆、评述的目的，不仅是追诉某些发动者、策划着、追随者、加害者的个人责任，因为五十年过去了，法定的追责期限可能已经超过了。但历史却不能被篡改，他们在历史上的罪责却应当永恒地篆刻在历史的记忆中，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铭记历史，做到以史为鉴了，后者才是我们回忆和反思的目的所在。

以上只是我们在写个人回忆时常常萦绕在脑海里并不断思索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如此，所以就尽量按这一思考，来书写那个时代发生在自身和自身周围的有关事情。我们的浅见当否，还望予以指点。■

4. 胡宗式指正 150 期

很高兴读到 150 期北京师大文革专辑（一）。它厘清一些事件，如“9.7”事件、砸孔庙等。师大同学受到的苦难，超过我的想象。深入探讨师大文革，对研究北京及全国的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感谢各位作者。专辑中有些问题：

- 1) 第 6 页：“与吴德讲了会”。此话不通。
- 2) 第 15 页：8 月 26 日 毛主席做出指示……。应注明出处；
- 3) 第 21 页：1967 年 4 月以井冈山造反团为主体猛烈“炮轰谢富治”轰动了北京。此事应当是 1968 年 3 月，高校学习班时期。
- 4) 关于“二月逆流”一处说江青作指示，一处说林杰作指示，又都不确切。
- 5) 第 43 页：吴传启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没有依据。
- 6) 第 65 页：足球地执行了这个方针。不通。

7) 第87页：谭参与组建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应当是第一司令部。■

5. 陈闯创指出第150期的诸多笔误

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文中多次提到的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应为“孙友余”。

第7页第1段的“盯稍”应为“盯梢”，第2段的“讲了会”应为“讲了话”；

第9页的“书国故址”应为“鲁国故址”，第3段的“豪称”应为“号称”；

第10页第3段说“林杰是《红旗》的副主编，关锋是主编”，这是错的，当时陈伯达是《红旗》主编，关锋是《红旗》编委会、中国哲学史组组长，林杰是中国哲学史组成员，第4段说“林杰1950年代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这也不对，林1961年毕业于北师大（参见阎长贵《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的辨正》）。

第11页最后一段说伊林·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写于1966年12月15日，并总结说信中要点之一是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时间有误、内容不确。这封信是11月15日写出并发表的，信中并未批评林彪所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而是批评林彪所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

第12页第1段说“12月16日晨北师大同时出现了两封给林彪的公开信”，作者分别是中文系的向东彪、林锋和物理系的刘中柱、杨以鸿，刘、杨大字报的标题是《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两张大字报都批评林彪的顶峰论，随后物理系的李文博与数学系的李世取（黑牛）公开支持。第13页第2段说12月17日上述四人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19日又在外语系批斗一次后押送专政机关，20日、21日又相继把李文博和李世取抓走了。经查，上述时间、标题、内容都有问题。根据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主办的《井冈山》1966年12月19日刊登的《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致“想不通者”》和《我

团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该校林锋、向东彪12月9日贴出《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12月11日刘中柱与杨以鸿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月18日黑牛贴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想法》；12月16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在北饭厅开会批斗李文博、向东彪、林锋、刘中柱、杨以鸿，在12月19日之前这五个人再加上李世取就被公安带走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了刘、杨的大字报，但把作者名称和学校误写为“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大字报里并没有批评林彪的顶峰论，而是说对林彪是可以批评的，伊林·涤西的公开信是革命行动，另外赞同伊林·涤西对林彪9.15讲话的批评。至于李文博，他是在1966年10月17日就贴出著名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内容和批林彪无关；（按：类似的时间和内容错误也出现在本期赵惠中《怀念“插班生”杨以鸿》第61页，把刘、杨12月11日大字报误作12月17日发表，同样误以为这篇大字报是在批评顶峰论。）

第11页第3段说“金宏达(时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为吴晗辩护的文章”，经查，《人民日报》1966年2月10日发表了时汉人“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第14页第2段所提报道《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查，该报道名为《在北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最初发表在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5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上，经毛泽东5月7日批示可公开发表后，《人民日报》于5月16日发表并配发社论《军政训练好》。

第21页第2段提到“杨以鸿1980年考取首届O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亦见于本期赵惠中《怀念“插班生”杨以鸿》第63页），“OUSPEA”应为“CUSPEA”，全称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项目），“犹太大学”应为“犹他大学”，即University of Utah，杨是1979年考取1979年CUSPEA试点第二批项目，比1980年的首届CUSPEA正式项目还要早（参见吴塘、柳怀祖编《CUSPEA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87页）。■

6. 刘明来信

此期《记忆》开了个好头。因我是1968年9月离校的,所以此前的事都经历过,此后的一些事对我来说是新闻。主要作者赵惠中是物理系69届,我是67届,他提到的人和事我比较熟悉。文革中的师大有很多应当记忆和反省的人和事,光是死去的上百人就应当统计和给出说明。现在相关文字太少太弱,怎么能尽快弥补?当时在校学生5000多、教师员工一两千,文科力量很强,不愿提笔,真是遗憾。现就此期文字作点评论。

1) 文革中《红旗》主编应是陈伯达,关锋是副主编。说关是主编林杰副主编,似不对。

2) 第20页,杨以鸿在美读犹他大学,不是犹太大学;

3) 第20页,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因批林彪进牛棚,当时物理系教师刘辽因57年被打成右派,被安排为系资料员,文革中也进了牛棚。刘辽一边被强制劳动,一边继续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给这三个63级的学生讲授广义相对论。这三个学生因祸得福,80年代先后被重点大学聘为教授。刘辽本人是我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对我的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研究也多有指导和帮助。我曾撰文敬献于他。

4) 此文提到的李文博,我很熟悉.1970年代我们同在黑龙江合江地区。7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后升级为佳木斯师院,现为佳木斯大学)教师。80年代调入北京印刷学院,97年转到北方交大,2006年病逝。

如果有北师大文革大事记,可转发给我。我可再转发其他同学,一起判读一下。

如果有北大、清华等校的文革回忆,亦请发我。■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